

編 者 的 話

为了帮助青年同志们熟悉阶级斗争的历史，增强阶级观点，我们特编辑出版了这本书。本书共收集了八篇文章，其中三篇是选自“宁夏文艺”，四篇是选自“宁夏日报”，还有一篇是由石嘴山市工会供稿的。这些文章，虽然只是反映了黑暗旧社会的一些点滴情况，但都是对旧社会的血泪的控诉，都是学习阶级斗争历史的好教材，希望青年同志们能够认真阅读。当然，本书不只是供青年阅读的，就是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读一读这本书，想一想自己在旧社会受过的苦，进行回忆对比，这对增强阶级观点，坚定革命意志，也会有莫大的益处。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共青团银川市委等部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编辑出版这类读物，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的工作。希望大家读了这本书以后，能够把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以便改进今后的编辑工作。



第一集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统一书号：3157.35
定 价：0.24 元

目 录

- 仇恨和欢乐..... 雷一禾 赵千里 (1)
- 长工成家记 罗 英 (12)
- 苦难生活四十年..... (27)
- 我过去的学徒生活和遭遇 樊德忠 (32)
- 一个老矿工的血泪史 关长秋 (38)
- 老三村的血泪仇..... (43)
- 汉延渠畔的悲号..... 黎 遵 千里 (61)
- 惨绝人寰的活地狱..... (78)

仇恨和欢乐

——贫农哈存义家史

霍一禾 赵千里

风雨飘零三十年

哈存义的父亲名叫哈安，是个农村中的小木匠。他在世的时候，家里有两间破房，十八亩薄地，两个大人和四个小孩。有一年春天，因为家里生活困难，他就向当地恶霸地主张耀坤借了十块钱。在借钱的时候，哈安虽然知道“张耀坤的钱，难借也难还，要想还清帐，炸骨又熬肝”这几句话，可是当时实在没法子，还是咬着牙根借了这笔阎王帐。恶霸地主张耀坤，用驴打滚的办法，在短短的两年，就把哈安家的七亩地滚进去了。土地被霸去后，张耀坤说：“帐还没有还清。”哈安听了这话，气的得了一场大病。在害病当中，他越想越生气，越生气病越重，过了半年光景，终于含恨而死了。

哈安一九二二年死的时候，哈存义才七岁。当时他家里虽

然还有点薄地和两间破房子，但由于田赋款项太重，苛捐杂税太多，使这个本来就困难的人家，生活状况更加悲惨了。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咋办呢？为了活命，哥哥哈存仁给地主柴四秀家里当长工去了。留下他和两个小妹妹，靠母亲给人做些针线活或其他粗活养活，一家人过着难熬的日月。就这样，狼心狗肺的张耀坤又来逼帐了，脚还没踏进门坎，便气势汹汹地说：“夫债妻还，父债子还，你们变牛变马，也得把我的帐还清。”这次张耀坤又霸去他家四亩地，除此而外，还逼着哈存义的母亲作了他家里喂猪、喂狗的使唤人。

哈存义母亲进了张家以后，撇下了他和妹妹在家里没人管了。他母亲不忍心让儿女们活活饿死，每次在喂猪、喂狗的时候，总是避着人挖出一点猪食或狗食，偷偷地拿回去给他们充饥。有一天他母亲从恶水桶里挖了一碗饭渣渣正准备拿回去，不料被张耀坤瞅见了。这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立刻就红了眼，冲过来把哈存义母亲按倒在地，狠狠打了一顿。碗被打碎了，人被打伤了，还说她是“贼娃子”，把她赶出了张家。临走时，张耀坤声严厉色地说：“从今以后，我张家门前的大路也不许你走，不然定要把你的腿打断！”

张耀坤两次共霸去哈存义家里十一亩土地，但土地每年应缴纳的各种税款，仍然要哈存义家里负担。有一天早晨，哈存义母亲没有在家，官府里的差人又催要粮款来了。那人一手提着木棒，一手拿着绳子，进门就连喊带嚷地骂道：“你们这些婊

子养的，睡在炕上装什么蒜，还不快点起来完粮纳税。”三个孩子一听吓得缩成一团，齐声大哭起来。谁知那狗仗人势的差人，一看大人没在家，又凶恶地骂道：“妈的，你们欠下粮款害得我跑腿，看我揍死你！”说着，举起棒子就向哈存义的左眼窝上捣去，接着又是几个耳刮子。哈存义的左眼被打得肿起来，一只耳朵也流出血，痛得他满炕上打滚，几乎昏了过去。从此哈存义就失去了听觉，成了聋子，左眼也逐渐失明了。

因为家里生活越来越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哈存义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去给附近蒋滩的一个地主叶振家里放牲口了。这家地主和所有的地主一样，心黑手毒，爱财如命。他为了让自己的牲口吃的膘肥力大，硬逼着哈存义把牲口吆到别人的庄稼地里去放。哈存义要是不按他的话去做，晚上回去就免不了挨打；要是按照他的话做了，那些受害的庄稼主人，就要在哈存义身上出气。这样一来，哈存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是挨主人的打，便是挨别人的打，浑身上下不是青伤便是红印。有一天他到外边去放牲口，叶振随上亲自把牲口吆到别人的庄稼地里，碰巧被那块庄稼的主人发觉了，叶振一见不妙，便沿着庄稼地畔溜走了，而哈存义直到那人到了跟前才拔起脚跑去。他在前面跑，那人在后面追，直追到黄河岸上。哈存义一看没路走了，便咬紧牙根跳进了那波浪滚滚的黄河。

地主叶振听说哈存义被逼跳了黄河，不但不问人的死活，反而找到哈存仁讹诈说：“你弟弟使了我的工钱，不好好干活儿，

竟敢跳了黄河。不行，这工钱你得还我，不然我就要到叶盛街上去告你。”哈存仁吓得身上发抖，只好答应过些日子退给工钱。

哈存义被那滚滚的黄水冲了二里多路，直冲到一块沙滩的边缘上才停了下来。当他甦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又是害怕又是恼恨，地主家是不能再回去了，只好拖着疲乏的双腿，来到了舅舅家里，正好母亲也在，这才哭着叙说了自己跳黄河的经过。他母亲一边听着一边流着眼泪，说啥也不让他再给叶振家去放牲口了。后来，舅舅凑了几个钱退给叶振，才辞掉这家的活儿。谁知刚刚逃离了虎口，终于又落进了狼窝，母子们到了没有能逃出恶霸地主张耀坤的魔掌。在他十六岁的那年，张耀坤领着狗腿子又来要帐了。这次不但把他家里两间破房子拆下来的桁条、大梁和几十根椽子拿去盖了猪圈，还把哈存义拉去给他家放羊顶债。在这种情况下，哈存义母亲无可奈何，先后把两个女儿给人作了童养媳，好让孩子有个吃饭的地方，自己也到叶盛街上给人推磨去了。哈存义在张耀坤家里受的痛苦就不用提了。一天黄昏，张耀坤骑马从外面回来，看见羊已经进了圈棚，不管哈存义吃饭没吃饭就叫他去遛马，哈存义遛了一阵子马，肚子饿的撑不住，就把马拴在桩上，自己到伙房去吃饭，一碗稀汤还没喝完，就被张耀坤看见了，当即叫来狗腿子，差点把他打死。

哈存义在张耀坤家里咬着牙熬了一年，心想这下总会把帐顶完了吧，谁知偏偏在这时候，羊圈里丢了一只羊。这只羊是

怎样丢的，当时谁心里也都明白，就是不敢说出口。羊丢了咋办呢？按照张耀坤的“规定”，丢了羊的赔羊，赔不起羊就得再干下去。哈存义没有法子，只得忍气吞声地又熬过一年。心里想，这次总该没事了吧？那料张耀坤把眼一瞪说：“世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放一年羊就能顶一只羊的价钱吗！”哈存义听了这话，真是火冒头顶，嘴上却没有敢吭声，他想了又想，要填满这个无底洞、还清这个阎王帐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就瞅了个空子，逃出了这个吃人的狼窝。

哈存义从张耀坤家里逃出去后，这个恶霸地主又乘势将他家里剩下的七亩地霸占去了。从此，这户人家就家破人散，各自逃生去了。

哈存义离开了张耀坤的苦海，又落入了另一个财主的深渊。这是永宁县纳家户的一个新发户。掌柜的叫盛光成，只有老两口，家业虽比不上张耀坤的大，心肠却和张耀坤一样黑。一年四季只知道叫哈存义给他们干活儿，却从不给吃顿饱饭。夏天，不管农活多重多忙，给哈存义吃的饭，不是能照见人影的稀汤，就是他两口子吃剩下的饭。一天哈存义在外面干了一天活儿，天黑了才回来吃饭，掌柜的老婆给他端出来的是几天的剩饭，霉酸味不要说吃的人难以开口，就连掌柜老婆向出端时，也都捂着鼻子。哈存义对这种饭刚露出不满神情，掌柜的在一旁就骂开了口：“这么好的饭你还不吃，我看是你的肚子还没饿着。”哈存义没有法子，只得憋着气吃了下去。从此

以后，他见了剩饭就呕吐，并且得了长年难以治好的胃病。冬天，不管天气多么寒冷，这个新发户为了从哈存义身上榨出更多的油水，还要他到湖里去打蒲柴去卖。哈存义穷得连双鞋穿也没有，只得光脚片子在冰上跑来跑去，不久他就得了寒腿病。掌柜盛光成平常总是无缘无故地骂人，有一次哈存义实在忍不下去了，便顶撞了几句，这一下把盛光成给惹火了，举手就要打他；哈存义的火也实在压不住了，一不作二不休，拾起土坷垃就朝盛光成的头上掷去，随后便急急忙忙拿上自己仅有的一件烂褂子，朝贺兰山方向跑了。

那时候有句老话：“天下虽大，没有穷人立足之地。”哈存义跑来跑去总没有个落脚的窝窝子，最后跑到宁朔县的史家坊，又给一个名叫史登第的地主当了七年长工。

哈存义到了二十八岁还是个光棍汉。这时候叶盛街上的几个穷朋友，很想帮他成家成起来。这几个人经过多次商量，终于给他找了个穷姑娘。这个姑娘名叫叶秀花，原来姓陈，自幼就死去了妈，父亲大半辈子都是以讨饭为生，所以人们都叫他“陈讨吃”。秀花长到十三岁的时候，父亲病的实在没法子，才把她卖给一家姓叶的人家当了女儿，所以她也就改姓叶了。

结婚，本来是个大喜事，可是哈存义办喜事的时候，却大大地犯了愁。他既没有房屋、土地，又没有穿的盖的，至于请客吃饭等等，那就更谈不上了。总算还好，后来借到了两间破房子，一间拴着房主人的毛驴，一间自己盘了个炕，这才有了

洞房。按照当地风俗，娶媳妇都是套着大车去接的，而他却办不到这点，只好借了个毛驴把新娘子驮回来。叶秀花来到新房一看，全部家当只有两个砂锅，两个粗碗和几双筷子，炕上铺了一条烂毡，放了一床旧被子，其他啥东西也没有。他们入洞房以后，房东家婆姨还再三再四地叮咛：“哈家，记着半夜里起来给驴添草。”叶秀花看了这个光景，听了这句话，不由得伤心落泪，他想丈夫倒是个老实人，就是人太穷了。说这个住处是洞房吧，旁边拴了人家的一个驴；说自己是新娘子吧，还得半夜起来喂牲口。她越想越伤心，越伤心哭的越厉害。房东家婆姨听见她哭，便隔着窗子对她说：“哈家，这有啥哭头呢？你还不知道：头顶人家的房，要受人家的降；脚踩人家的地，要受人家的气。”叶秀花一听这话，虽然心里难受极了，但也不敢再哭下去了。哈存义这时候心里也很难受，可是他却在旁边安慰新娘子说：“只要人都壮实，何愁将来没有好日子过。”叶秀花听了这些话，心情才好了一点。

哈存义和叶秀花结婚以后，他又给地主史登第的哥哥史登瀛家里当了一年长工，以后就一面给人作短工，一面租了几亩地种，心想这样总比当长工赚的钱会多一点，以便养活母亲和自己将要降生的孩子。可是事情并不那么随心愿。那阵子马鸿逵匪帮年年抓兵要款，到处闹的乌烟瘴气。保长为了敲他们的竹杠，先派哈存义去受“国民兵训练”，后来明知道他是个聋子，眼睛又有毛病，却派保丁把他抓去押了起来，说要送他去

当兵。这一下可把叶秀花吓坏了，她把自家从租田里辛辛苦苦收获的近两石稻米送给保长，央求快点把人放回来。而保长收了这些稻米以后，口头上答应放人，行动上却没有一点放人的意思，前前后后押了四十多天，直到上面验兵以后，才因为耳聋被放了回来。在验兵的那天，哈存义没听见叫他的名字，还挨了一顿鞭子，头上又被打了个窟窿。粮被敲诈光了，人被打伤了，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两口子想到这里，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一声炮响亮了天

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在黄河东岸的金积等地响起来了，那轰隆轰隆的炮声，给河西的广大穷苦农民带来了希望。

共产党来了，新的时代开始了。穷人们给人当牛当马的历史结束了。解放不久，哈存义就从史家坊搬到自己原来的老家，现在的光明大队去了，又从叶盛街上把母亲接了回去，一家人这才团圆了。

一九五〇年冬天，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叶盛地区开始了。广大的穷苦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和千百年来封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恶霸地主张耀坤被广大群众斗争以后，人民法院根据大家揭发出来的种种罪行，给他判了死刑。哈存义在这场斗争中，从头至尾表现的都很积极。在斗争大会进行以前，他在贫农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串连了许多穷苦农民，搜集了张耀坤

许多罪恶事实；在进行斗争的时候，他在大会上控诉了张耀坤对他家进行的各种迫害和剥削，把自己多年来汪在肚子里的苦水吐了个净，使张耀坤在事实面前低下了头。哈存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伸了冤，报了仇，分得了胜利果实，就连从前被张耀坤霸去了的十八亩土地也回了老家。这些回了老家的土地，按人口计算，除有七亩归他哥哥哈存仁外，其余的都归了他自己。这样一来，多少年来扎在哈存义身上的穷根终于被拔掉了。

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以后，哈存义两口子的劳动热情很高，但是在生产和生活方面仍有许多困难。如由于缺少牲畜、农具、种子、肥料……，所以各种庄稼的收获量都很低。拿一九五一年来说，这一年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吃。如果再遇到个什么风、旱、雨、涝或其他的意外，困难就会更大一些。后来，当党和人民政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时候，哈存义一家人首先参加了互助组。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家里的人口增多了，生活比单干时却好的多了。当时不仅吃穿不愁，还盖了一间新房，买了一头毛驴，添置了许多农具。一九五五年成立初级农业社的时候，他又领头参加了初级社。他入社以后，对集体事业无比关心。这一年的夏天，眼看社里的稻秧快要死了，社员们都说：“今年的稻子完了。”可是哈存义心想，这是自己的庄稼，大家的吃穿都在这庄稼上，可不能叫它瞎了。于是他便没黑没明的奔忙在田埂上，放渠水，撒清水，费了十多天的功夫，终于把社里的一百亩稻子救过来了。后来这稻子长的

很好，每亩产量都在四百斤左右，社员们分到稻谷后都高兴地谈论着：“这是完了的稻子，叫哈存义救活来了。”这一年年终社里评选先进人物时，他被大家选为生产队的劳动模范，并在稠人广众之下第一次带上了红花。一九五六年初级农业社转为高级农业社时，他被大家选为生产队的生产组长。在这一年，他还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哈存义在党的直接教育下，觉悟更加提高了。这一年冬天，他受农业社的委托，带领车队到贺兰山出拉石头，一天到了刘家沟，太阳就落山了，卸车后大家都赶着牲口到唐徕渠去饮水，哈存义见三十头牲口站在冰上，把冰压的忽闪忽闪，他着了急，连忙下去往上赶牲口，在紧赶慢赶当中，有两头牛陷到冰窟窿里去了。这时哈存义不顾一切，跳到冰窟窿里将牛牵住，然后喊来大家，连拉带抬地才把牛救了出来。哈存义虽然身上已经冻成冰棒，但心里却热乎乎的。牛赶回去后，他又熬了个通夜给牛烤火，直到第二天牛吃草了，他才放下了心。

一九五八年秋天人民公社成立后，他担任了两年多生产队的生产组长，从一九六一年起到现在，他一直担任生产队的队长。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头两年遇到了旱灾和其他一些困难，但他领导社员搞好生产的干劲始终没有松懈。平时他除了和社员们一起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外，在农业生产上的一些重要时刻，如播种、淌水、收获等日子里，他白天和大家一块劳动，晚上还经常一个人出去检查，所以他领导的第五生产队，这几年在生

产方面从来没有落后过。哈存义不仅对集体生产抓的紧，对社员们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如一九六一年他宰了七十斤重的一头猪，当时市场上的猪肉价钱虽然较高，他却没有拿到市场上去卖，把大部分肉借给社员们吃了。哈存义对阶级敌人的一举一动，平时都很留神。如解放前当过地主狗腿子、解放后始终对人民政府表示不满的张秀，有一次把生产队的木叉偷回去烧了，他知道这件事后，当即跑去把张秀狠狠地训了一顿，要张秀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哈存义常对社员们说：“我们大家都要警惕一点，敌人并没有睡觉，如果疏忽大意了，好日子就会保不住的。”

哈存义的幸福日子越过越甜。现在他家里四口人，他夫妇参加劳动，女儿和儿子都在学校里念书。这几年来，他家里除盖了三间房子外，还添置了许多重要的生活用品和小型生产工具。目前，炕上不光铺着席子，还铺着毡和毛毯，连自行车也有了。哈存义经常指着这些东西对孩子说：“这些东西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咱们带来的，在过去不要说骑自行车，就是干完营生想骑一下地主的牲口，还得挨打挨骂。”有一次他女儿盖了一床毯子睡觉时嫌扎，哈存义听见了，就狠狠批评她说：“过去我和你妈结婚时，还没有捞着个毯子盖，现在盖上这样好的东西还嫌扎，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呀！”哈存义自从发现孩子有这个思想以后，便经常有意识地给孩子们讲过去的苦日子，使孩子们从新旧社会的对比中，懂得什么叫苦，什么叫甜，使孩子们永远记住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长工成家記

罗 英

一九四二年春末，正是浪稻子时节，宁朔县叶盛堡北边王渠下庄子上，传出来一件新事。地主王保长，出钱为他家长期在定边放羊的长工陈受业娶了个婆姨。那个年青的婆姨，是个体格健壮的十七岁的姑娘，西南叶家庄子上的，名字叫叶根香。地主还借给他们房子住。从小受苦的放羊娃陈受业，如今有了家了。

当时，各家屋里多有悄悄议论的，有的就不免带着些感叹说：“哎，地主有九十九恶，看来还是有一善哩。”

事情原来是这样

一天过午，做活的陆陆续续由地里回来吃中午饭。各人端上饭菜，蹲在院里吃着，长工老徐，见满碗菜泥烂草污，吃在嘴里咯碜牙。他越吃，越上气，把菜碗往地下一掷，说：“这菜洗也不洗，沙子、虫子、草籽子，倒是啥都全着哩。”于是众人你一句，我一句，都说菜不干净。“砰！”灶房里传来了

沉重的摔东西声，接着就听到当家奶奶骂起来：“为奴的们嘴还尊贵哩，奶奶亲手做给你们吃，还要折你们的寿哩，过几天就要找个喂猪的来！”

过了几天，陈受业由定边回来了。进到上房，掌柜的王林正躺在大烟盘子旁边，给当家奶奶烧烟泡哩。陈受业靠门边站下，叫了声：“掌柜的。”

王林只抬了一下眼皮，望一望陈受业说：“走乏了吧，蹲在那缓一缓。吃了没？”

陈受业慢慢蹲下，说：“没吃！掌柜的叫我回来啥事？”王林想了想，做了个笑脸说：“没啥。”他朝外吼了声：“拿茶来。”灶房里，王林的堂妹子赶忙把他的小瓷茶壶捧了过来。

陈受业低着头蹲在那里，不声不响地等着。王林喝足了茶，这才说道：

“陈受业，你打十七岁进我的门，如今也有十年了。你这娃是吃我的饭长大的，说起来就算是我家的人一样。这些年给我务育羊，务育的也可以。你今年整二十七，现今我看好了一个丫头，打算给你娶过来，房子我有，婆姨娶过来，我管饭给你养着。关于辞活要走的话，你也就别提了，往后好好地给我干。”说完，他一伸脖子，就着小壶嘴啜了一口茶，翻起小母猪眼望着陈受业。

陈受业睁大眼珠子，怔了一会，低下头又想想，慢慢说：

“行。”

娶亲的前一天，女家的爹求上王家门，说是丫头的衣服烂的出不来屋，求点布做件衣裳。王林叫当家奶奶开开柜子扯了几尺布，老汉拿上，临走时又求道：“保长，说亲的那四十块钱，啥时候方便，你老就赏了吧。”

王林垂着眼皮子，半天才说：“行，你先拿布给娃做衣服去。”

当家奶奶望着老汉走了，回头埋怨掌柜的：“看你好说话的，几尺布就白给哩？”掌柜的眼皮子没动，说：“拿过帐包来。”当家奶奶拿过一个黑布包，王林翻出一本帐，一面写着，说：“陈受业今年的三丈布，就算给过了，你就别再给了。”

姑娘娶过来了。

陈受业和叶根香，都是苦水里泡大，如今结成了亲人。新房里，光板炕，没席子，天还很凉，下头没铺的，上头没盖的，二人商量，想跟掌柜的支个钱，买个铺盖。

第二天一早，当家奶奶来叫了。

陈受业进到上房，王林撂下烟枪，由炕上坐起来，说：“我本心叫你跟婆姨多住几天，定边那一百多羊没个托靠的人，我也是不放心，吃罢饭你就走吧。”

陈受业刚要回身，王林叫道：“慢，”他躺下去，拿起烟枪，说，“娶婆姨是我替你花的钱，”抬头叫当家奶奶道，

“拿帐包！”

他翻着帐本，举起来对着陈受业：“看，这些年你也零星不断支着花，我给你娶婆姨的钱，拿帐上的存钱顶，你还短我的，差点也就算了，我不跟你要了。”

陈受业愣了，心想：自己整年在定边放羊受苦，也舍不得回来支个钱花，娶婆姨说是花了四十块钱，可是十年的工钱，也有四百多块哩。”他愣了半天，嘴动了儿动，也说不出个什么，看帐吧，不认字，低下头去又呆了半晌，两只手抱着头，捂捞着一寸多长的头发，最后，还是低低说了声：“行。”

王林笑着点头说：“你就吃饭去。”

吃罢饭，陈受业和叶根香站了一会，掉头出门，叶根香见炕上丢下一个小包包，忙追送出来，陈受业推道：“这羊毛，你留下，也没个别的啥。”又站了站，走了。叶根香双手抓着小包包，回身望着地主家高房大院，举目无一个亲人，呆呆的回来，眼望着冰冷光秃的屋子，不知往后的日子怎么个过法，一头倒在土炕上，止不住那眼泪顺着腮流下来，滴湿了土炕。她正流泪，就听当家奶奶喊叫：“套驴碾米去。”

两袋稻子，换驴不换人，直碾到下半夜，刚刚卸了碾，当家奶奶已经睡醒起来，说：“去，打水、洗菜、切菜、泡米，鸡一叫，有三十多人吃饭哩。”

十七岁的叶根香，正是贪睡的年纪，又劳乏了一天，此时困乏的两眼模糊，一拐一拐进了灶房。当家奶奶叼着烟袋，

蹯脚稳坐炕头上，撇着嘴说：“有个啥困的，年青人，精神越用越有。”

直到鸡叫，当家奶奶喊起长工们催着吃饭了，才又回上房睡觉去。叶根香伺候众人吃罢饭，王林的堂妹子走来，说又要提水、洗菜、切菜、泡米做晌午饭了。

就是这样，一天四顿，好比那牛儿不卸架，更不说当家奶奶开口骂，张手打。常言道：当了长工，有谁心疼。从此不说日出日落，哪论天阴天晴，苦驴儿拉磨，一匝又一匝，叶根香从早到夜只是个磨面、碾米、洗菜、做饭，苦死了无人管，累死了无人问。

又是一天傍晚，叶根香正洗菜，一抬头，见老爹站在门外头。老汉那灰白的长头发，沾满泥土，饥黄寡瘦的脸，黑里透灰，皮包骨头的焦黑手臂裸露在外，烂袄袖只剩了半截。在晚风中，那穿了多年的破单裤子，一条条一片片的，连身子也遮挡不住了。叶根香张了张嘴没出声，又低下头来洗菜。那热泪可就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可怜的老爹望叶根香蓬头散发，困乏得有气无力，两只眼熬成了红桃子，只叫了声：“娃呵，”老泪就潸潸地流下来，“你妈得病，想你哩。”

叶根香去请假，叫掌柜的骂了一顿，不准回家。她回来哭着向爹说：“走不了，走了抓回来往死里打呢。”老爹抱着头蹲了一会，站起身说：“要咱那四十块钱去，给你妈治病。”

烟灯跟前，王林烧着大烟，眼睛不看老汉，只说：“你先回，过一半天一定给钱。”

老汉回到家，见老婆子正在寒冷发抖，忙脱下烂袄子给老伴盖在身上，一家人挤着睡到半夜，猛然“砰砰！”有人砸门，门开了，闯进几个保丁，从炕上揪起老汉十八岁的儿子，捆上就要带走。老汉跪在地下，王林进来了，喝道：“快带走！”一家人哭着哀告，王林吼着：“你家该出兵，想不出兵就拿兵款顶。”老汉光着一身瘦骨头，跪着求告：“王保长，你看炕上的病人，吃药的钱还没有哩。”王林把屋内各处看了看，说：“这么个，兵款我给你缴上，嫁女儿的四十块钱就算顶了。”

王林命令保丁放了叶老汉的儿子，钻出叶家的破屋子，回家睡觉去了。

喜

收罢麦子又收秋，中秋一过冷飕飕。陈受业一心念着叶根香天冷没衣裳，这一天天黑时回来了。叶根香一见他，止不住那眼泪流下来。夫妻对着脸站立了好一会。陈受业转身走进上房，跟掌柜的借钱买布给婆姨做衣裳。再买条毛毡给婆姨遮寒。掌柜的说没钱，只借给五块叫去买布，至于毡么，说：“买新的贵着哩，要花二十块钱，我仓房里有块旧毡，可以当新的用，只要你十八块。”扔给陈受业一块烂毡，陈受业夹回

屋来，从此夫妻才算有了块毡盖。

第二年春天，又是浪稻子的时候，叶根香有喜了。

在別人，怀了娃娃是喜，在叶根香，那真是灾。浪稻子时，连短工要有三十多人吃饭，一天四顿。掌柜的那堂妹子，在家干活干到二十几，终于年时出嫁了。灶上地下的活儿死活就是叶根香一个。头胎娃娃苦死娘，叶根香整日吃不下喝不下，恶心呕吐，身子懶，肚子疼，干活沒精神。当家奶奶越看越气，整天地罵：“脏婊子你沒安好心，编法造孽哩，想不干活吃累奶奶吗！”

拖着大肚子，吃尽了苦，受尽了罪，这一天鸡叫时，叶根香倒在锅台边，娃娃生下来了。长工老徐，喊来人一起帮着把母子抬回屋子去，抱一抱柴填热了炕。

老徐求当家奶奶：“大人沒下奶，给娃灌点红糖水吧。”

当家奶奶更生气哩：“沒奶饿死去吧！有了娃娃还能给我干活吗！”

王林却一口吹灭烟灯说：“你悄着！有了娃娃是喜。”

中午，当家奶奶端着一个碗，笑嘻嘻进屋来了：“奶还沒下来呢？娃饿的哭，掌柜的疼娃，叫给娃灌点红糖水哩。”叶根香望着碗里黑红色的湯水，心里怕有大烟，有心不叫灌，又怕当家奶奶翻脸，只将娃用手护着，当家奶奶一把拉过去，硬给娃灌下，娃倒不哭了，睡着哩。当家奶奶和气地说：“沒啥，只要娃不受屈，吃几斤红糖也沒啥，天天灌点喝。”

第七天上，
当家奶奶催着叫
起炕：“娃生下，
身子就轻了，好
干活哩，咱家
忙，比不得别家
闲，养了七天，
足足的了，快
起。”

叶根香放下
娃，挣扎着爬下
地，扶着墙走进
灶房，只觉全身
绵软，头晕脑
胀，天旋地转地
只想呕吐。两只
手伸进冰水里洗



菜，产后身子虚弱，冰水象刀子直刺进骨头里，她全身打颤，脸上也变了颜色，冷汗珠子挂了一脸，流了一身，连头发也湿了，拼上死命干着，慢慢地眼睛发了黑，胸口闷塞，气也出不来了。挣到中午，回房看娃，只见，娃直挺在炕上，小眼珠瞪出来，嘴里吐出的白沫流在了破毡上，已经死了。叶根香一头

哭倒在炕上。

长工们吃不下饭，围在周围，想劝劝，说不出话。当家奶奶说：“唉，没有你这么不颠娃的，奶下不来，生把娃饿死哩。”

旁边老徐，一抬头眼里掉下两颗大泪珠子，说：“啥饿死的，娃全身都青哩！”

兄 弟

那混浊的黄河水呵，日夜不停地流，这受苦的岁月呵，何时熬出头？说话就到了-一九四六年。这一年，陈受业离家流落在外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十五年前，也是这么个春天，家乡的张保长抓兵，十六岁的陈受业在沟边放羊，被抓住绑走了，那可怜的爹妈和兄弟，连一面也没见上。兵营里非人的生活实在熬不过，第二年上半年，他冒着风雪逃跑了。听别人说：抓住逃兵要枪毙呢！从此，他就再不敢回家，流落到这黄河边上，为地主王林放羊受苦。十几年的光阴，严寒酷暑，在定边那苦寒的荒山沟里，日夜与羊群为伴，整月不说一句话。只是心里念着一个事，我那可怜的爹妈怎么活着呢？我那年幼的兄弟可长成了人！

三月间，陈受业回王渠来拿粮。这天太阳落时，有个讨吃花子来找陈受业，原来是二十一岁的兄弟陈万成。爹妈早没了。小兄弟在外讨吃流浪了四五年，终于今天打听亲哥的下

落，投奔了来。

隔着窗望见有个讨吃的站在院里，王林走出上房来，他——见到这种人，心里就有几分气。喊着就往外赶：“贼娃子你敢到我院子里站，走走走，快出去！”

老徐迎上去说：“掌柜的，这是陈受业的兄弟。”

王林瞪起眼：“啥兄弟？兄弟也不行！偷了我的东西你们谁敢担承？”说着就拿起打人的棍子。

陈受业忙推着小兄弟走出门外头，老徐实在看不过，由灶房端来一碗饭。王林横起棍子挡住：“你要干啥？”老徐说：“可怜那娃大远的奔了来，给口吃的再叫走。”王林立逼着往回端，说：“他就不该来，吃着了，他还天天来吃哩，不行！”又朝外喊道：“陈受业，你告诉他，一刻也不许在庄子里站，快叫他走的远远的，再敢登我的庄子，就吊在树上往死里打！快走！”

陈受业进门央求，王林用棍子敲着陈受业的肩膀，说：

“哎，你年青着呢，人心难猜透，他这个样子，你知道他干过啥，十个讨吃九个贼，小心他干出歹事牵连了你，快叫走！”

眼望着可怜的兄弟无处投奔，陈受业心酸难忍，脱下身上的烂羊皮，披在万成身上，说：“你披上走吧，别的就再也没有了。”万成望哥哥脱得精光，就问：“你给他干这么些年，咋啥也没挣下？”陈受业嘴动几动，眼睛里落下泪。陈万成跳起喊着：“我去问问他！”陈受业急忙抱住了兄弟：“人家是

保长呀，说把你咋，就能把你咋！”叶根香，将小羊毛包包塞到万成怀里，又从衣襟底下拿出两个馍馍，说：“走吧。”陈万成一跺脚：“咱闹不过他狗日的！我走！”说着就把羊毛包包推给嫂嫂，拉下破羊皮扔给亲哥，回头就走了。

苦 瓜

苦瓜蔓儿结苦瓜，为的把种留下。

一九四七年收秋时，叶根香又生了个娃。她一心念着，陈受业是个孤苦可怜的人，挣死挣活，只要把娃养大，也是他世上的个亲人呀，生娃后，躺在炕上，心里总是个发慌不安稳，当家奶奶进进出出，脸子象铅铁般阴沉，好似不知那一刻就要掉下冰雹来。自己躺的心惊肉颤，可是，这时候就是想起炕，也实在起不来，苦熬这几年，身体大不如从前了，加上生第一个娃时，两只手臂被冰水浸的落下抽筋骨头疼的病。这次生娃也没个啥吃喝，此刻，她是虚黄浮肿，身子就象瘫了的一样。

第六天头上，当家奶奶走过来：“我看你躺的太平着哩，长年的吃着我，要想赖在炕上不动弹，门儿也没有的事，快起来做饭！”

叶根香气也没吭，死命地爬起来，咬牙下地做饭。

过了一个多月，娃长的倒还健壮，看一眼，真是喜人。

这一天做活的人们吃罢夜饭，叶根香已是乏的睁不开眼，给娃喂完奶，望着娃睡安生了，一合眼也就睡死过去。

半夜该做饭的时候，醒过来，低头一看娃，吓得叶根香一翻身爬起来，只见娃象前一个孩子一样，浑身全都发了青，小眼珠瞪的多大，嘴里吐出的白沫流了一毡。娃直挺挺的，已经死了。

叶根香一头栽倒在炕上晕过去了。从此她病倒起不来了。

老徐找掌柜的借钱给治病。掌柜的不答应。

她一阵阵热烧昏迷，两奶都肿得发了紫，醒来时也不吃不喝，只是个流泪。

望着病重了，老徐又去求，说：“眼看人要完了。”王林一听，知道真是病重了，赶快叫长工们把她抬走。众人说：

“没家的人，往哪里抬？”

王林立逼着抬：“快抬，抬远远的。”长工们抬着半死的叶根香，拿着她的一条破毡，一小包包羊毛，一起放在一间没人用的破碾房里。她躺在碾盘上，没吃没喝。庄子上的人望着实在可怜，端碗米汤来喂一喂。

老徐和伙伴们商量，不能望着叶根香不管，大家凑了钱为她治病，叶根香哭着念着，思念亲人陈受业。老徐来到上房请假，想走定边叫陈受业回来和叶根香见一面。掌柜的说：“不行！你不能撂下我的庄稼，陈受业不能离开我的羊。”

在田里割着割着稻子，老徐猛把镰刀朝远处一撇，拔脚奔黄河边，过河走了定边。可是陈受业来回后，脚还没站稳，就又走了。是地主赶走了陈受业，碾房里扔下叶根香一个人。冬

天冻死人的大风一刮起来，灰土就要把她和她那一块烂毡，一个小羊毛包包都遮盖起来，这是个什么样的冬天呵。可是，叶根香没有死，她活到了春天。

春 天

一九四九年，毛主席的队伍来了。祖祖代代受苦受压迫的人们，解放了。陈受业由定边回来了，陈万成从吴忠来找王林算帐来了。王林叫当家奶奶拿过帐包，翻着叫陈万成看，陈万成说：“嘿嘿，王林，你这本帐咱还是叫人民政府去看吧，我们还得和你把总帐算算哩。”原来，他是听见干部讲了好多政策，特地跑了来的。

总帐，是土改的时候算的。过去受苦受压迫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斗倒了地主，把王林绑送人民政府法办了，然后是分土地，分粮食，分财物。

陈受业和叶根香，分了三间房子，六亩地，一匹马，还分了衣服、家具、粮食、羊。这两位受尽了苦的长工，才算是真正的成家了。

这一天，老徐和庄子里过去一同受过苦的伙伴们都聚集在陈受业的新家里，叶根香在自家的锅灶里为旧时的苦伙伴们做了顿饭吃。大伙吃着饭，喜笑颜开地嚷嚷着谈论着，说过了新春咋浪稻子，咋闹生产。饭后，人们坐在陈受业家的热炕头上嘻嘻哈哈的争吵不已，一个个脸上红扑扑的，人人都觉着已经就

是春天了。自古以来也曾有过多少个春天，可是受苦的人们哪里有过春天，今日，开天辟地第一遭，受苦人的春天来到了。

后 記

陈受业与叶根香一家的故事，就说完了，可是生活仍在继续前进。老陈现在又去定边放羊了。放的是集体的羊群。叶根香愉快辛勤的劳动，是为集体经济为幸福生活而劳动。说到生活，那可是不同了。今年，我第一次见到叶根香，是打秋场的时候，看模样也就三十多岁，又强壮、又丰满，真是常言说的“发福”了。傍晚，我应邀来到她的家，屋子院子整齐而宽敞。一进屋，见一个满脸紫红、眼睛明亮的人，在炕边上坐着安静地吸着烟。两个娃娃在他的身前身后耍闹。他一点厌烦的神色也没有，相反，好象觉得很舒坦。见来了人，就憨厚地笑着让坐，但，嘴动了儿动，没说出句话来。他就是陈受业。很巧，他今天回来拿粮来了。

他们现在有四个娃娃，大女儿春梅，十六岁，据说劳动起来可歪着哩。二的是男娃娃，十一岁，三的是丫头，大眼睛，胖呼呼的很好看，四的也是男娃娃，更是胖的喜人。提起那块全家盖过多年的烂毡，如今炕上铺的可不是它，而是一块铺满一条大炕的雪白的新毡。炕里靠墙叠着一叠厚厚的各色花棉被，最下层折放着那块薄薄的褐灰色的烂毡，别看它同花棉被和铺满大炕的雪白的新毡比起来，显得太寒伦了，但是，在已

往苦寒的灾难的岁月里，它曾给过这家人多少温暖呀。它是和这家人共过多年患难的老朋友，也是新旧两个时代的见证人。谈起当初那受苦的往事，春梅姑娘显然听着十分惊奇，她瞪大了眼睛听着。叶根香转脸挂着泪对娃娃们说：“娃娃们，不论到了啥时候，咱可决不敢忘了根本呀！”

老陈，叼着那烟袋，坐在热炕头上，只是低头深沉地回忆往事，他就是不喜欢讲个话。

我望着那崭新的红油漆大柜，上面叠放着新衣服。天冷了，这是叶根香为自己女儿做的一件新袄子。眼前这是多么温暖的一家人呀，在党的温暖阳光下，在社会主义的春天里，幸福正在开始呵！

（步升插图）

苦难生活四十年

贫农李生东，是石嘴山市礼和公社永平大队第一生产队的饲养员，今年五十四岁。他在解放前当了大半辈子长工，做牛做马，挨打受气，受尽了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最后被弄得家破人亡。所以他一提起旧事，就眼泪汪汪。他说：

“我今年五十四岁，但我真正的生命还是从解放后才开始的。我四十年泡在苦海里，共产党、毛主席把我救了出来，我永远忘不了共产党毛主席的恩情。”

—

解放前，李生东一家原有六口人：他爹，他妈，三个妹妹和他自己。虽然有二亩薄田，但是反动派经常派税摊捐，加以缺乏农具子种，怎么也养不活六口人。他爹不得不给地主扛长工，他妈也经常去打短工。一到冬天，地主家的活少了，他爹就背上破筐筐出去贩卖辣面。就这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地一天天熬下去，日子越过越穷。家里不但没铺没盖，连一块破席片也没有，炕面子也是烂得坑坑洼洼的。全家只有一个烂皮袄，白天他爹穿上去干活，晚上就给全家盖上。除了烂皮袄，家里就

只有一只熬菜糊糊的沙锅，这就是他们的全部财产。

李生东八岁时，家里穷得没法过了，他爹不得不送他到马地主家放牲口。李生东在马地主家的生活简直不是一个娃娃所能忍受的。不管刮风下雨，他一年四季披着妈妈的烂褂子，一直到十三岁还不知道穿裤子的滋味。地主不把他当人看待，嫌他脏，骂他臭，连吃饭也不叫在屋里吃。冬天刮着西北风，卷着漫天大雪，他也只得卷缩在房檐下吃饭。一碗稀糊糊刚端出来，就冻冷了。他一面吞嚥，一面牙齿直打颤。这种悲惨的生活把他折磨得脸黄肌瘦，不成人形了。

有年夏天，他在放牲口时，因饿得没有精神，一不在意，毛驴吃了几口庄稼。地主知道了就把他一顿痛打，吓得他跑了出去，到深夜也不敢回家。他妈急得到处找寻，最后在一块糜田里找到了。小小的娃娃躲在糜田里，屁股都叫蚊子叮肿了。母子俩个相抱着大哭了一场。哪个父母不心疼孩子，但为了生活，不得不左哄右劝地把他拉了回去。

1921年，李生东十二岁的时候，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他爹就带着一家人逃荒到头闸，全家给地主当了长工。

二

李生东十四岁的时候，他母亲又怀孕了。在旧社会，穷人怀孕就是苦难。为了生活，她不但不能休息，还得加倍地劳动。地主阶级是不顾穷人的死活的。李生东的母亲怀孕已八个

月了，行动很不方便，但地主硬叫她到渠边摇水车，向河里车水。这是非常累的活，她实在受不住，终于晕倒在地上，熬到家里就流产了。由于没钱医治，两天后，李生东的母亲就死了。千斤重担落在父子俩人肩上，他们向地主好说歹说，才借钱把母亲埋了。从此，就穷上加穷，日子更加没法过下去。

为了摆脱那缠住一家的债务，他爹一狠心，将七岁的亲生女儿——李生东的二妹，以二十块银元卖给了地主田家。为了免使一家人悲痛，他爹只说有人要雇二妹去看孩子。但是李生东看二妹一去没回来，便逼着问爹。他爹泪流满面地掏出二十块银元说：“卖了！”一家人大哭一场，从此就再也见不到二妹的面。

卖了二妹，并不解决他家的贫困，他爹接着又把六岁的三妹，送给别人，以减轻家里负担。但是，在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下，仅有的三口人仍活不下去。李生东的大妹十五岁那年，也不得不卖到地主家去当童养媳。李生东的三个妹妹，就这样地从苦海进了火坑。从此一家人东离西散，只剩下父子两人。

三

1929年，李生东二十岁，父子两人又回到了李家庄。原有的二亩薄田，因他们长期逃荒在外，而被富农侵占了。没有办法，只得仍旧给地主当长工度日。过了二年，谁知又遭到马匪抓兵的厄运。这次抓兵，原来是要一个富农儿子的（因为他家

有三个儿子)，但他们使了錢。俗话说：“有錢能使鬼推磨”，伪保长就把穷汉独子李生东抓去顶替了。他无可奈何地丢下老父亲在马匪军营中混了七年。

李生东在马匪军队中无日不想念年迈无靠的父亲和卖掉的妹妹。他日思夜想，整天精神恍惚。操练时常常因弄错方向，走错步子，挨了不少的打，有时一天就要挨三次打。但越挨打，他越昏头转向，嘴里不敢吭气，心底比黄连还苦，暗地里不知流了多少辛酸泪。由于长期受到反动派的折磨，慢慢患上了“气蒙眼”，相隔一二十步距离就看不清东西。马匪见他不能再供驱使就把他赶了出来。

二十七岁的李生东回家了。他的眼睛有病，扛长工也沒人要，他父亲又年老多病，父子两人只得给地主打短工，有一頓沒一頓地勉强度日。

李生东四十岁那年，富农李生和想永远霸占他的二亩田，就巧立名目，向他索取十二块银元的注册费。李生东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哪有十二块錢，这明明是乘机勒索。李生和看他拿不出錢，就派狗腿子把他捆起来，吊在房门上，拿起胖柳枝，狠毒地抽打。他打一下问一句：“你出不起錢，还要不要田！”一下一下地抽打着，李生东痛入骨髓，无比悲愤。在旧社会中穷人连自己生命也保不住，怎么还能保得住身外的土地呢？李生东受尽欺凌，有怨无处诉，眼睁睁叫人把土地霸占去了。

李生东解不透：穷人真有这样受不尽的磨难，受不尽的

罪吗？

四

李生东在旧社会做牛做马地爬了四十年，终于站立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李生东跟全国各地的贫雇农一样，在政治上翻了身。长年压在他身上的大石头——地主阶级被扳倒了，长年缠住他的贫穷也赶跑了。他在土改中要回了自己的二亩土地，还分到毛驴和粮食，生活逐渐好转了。

党指引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他就积极响应，并当上了互助组长。全组在他的带动下，经济情况很快地好转起来。他四十年来头枕坷垃，不知道睡枕头有怎么舒服。合作化后，他第一次枕上了新制的枕头，穿上了新缝的棉袄。他翻身不忘共产党，坚决听党的话，努力为集体办事。由于他能认真操料牲口，入社后当上了饲养员。他想到旧社会没有牲口没有农具的痛苦，精心地为集体喂好耕牛，在他的努力下，耕牛膘肥体壮，劲大力足，繁殖也很好。所以他连续四次被评为劳动模范，1957年还出席了惠农县在宝丰召开的劳模大会。他处处关心集体，集体也给他很大的荣誉。解放后，他有了两个孩子，重盖了二间新房，添置了一辆自行车，1962年又在平罗找到了他的二妹，他满意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哪里会有孩子，哪里还能找到亲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埋在哪里呢？”

（石嘴山市工会整理）

我过去的学徒生活和遭遇

樂德忠

一九三七年，我跟父亲从徐州流落到西安。父亲原是个模型工人，但因没有木工活干，只好在西安兵工厂当临时的泥水工，收入只够一个人生活，养不活我。我那年才十五岁，就进了一家小铁工厂学艺。

在旧社会当学徒，实际就是给资本家作奴隶。早上乌鸦一起飞就得干活，一直干到半夜。吃点稀饭和玉米窝窝头，也不给吃饱。说起掌柜的打学徒，那是家常便饭。叫拿东西，稍慢一点，或者干活稍不如意，拳、脚、铁把、木棍，都上来了。掌柜的打人成性，而且打出窍门来了。一个巴掌上来时，我脸被打往另一边，那边又顺手来了一个更响的巴掌，正打得昏昏沉沉、站不稳时，下身来了一脚，正好跌翻倒地，刚站起一点，又追加一脚，又跌下去。每次挨打，一般都要这样来三四遍，才肯罢休。有一次我下料时，把铁皮下得宽了点，掌柜就用铁皮向我抽来，划破了衣服，腿上也割成孩子口样的一道大伤痕。我忍住痛，忍住泪，又怕天热烂了肉，等掌柜的走后，

用牙粉敷住伤口，幸亏没有化脓。这样的伤痕在我身上是数不清的。打伤，掌柜的不管，工伤当然更不管了。我的右手两个手指头给机器压坏了，掌柜的不给治，还是我父亲通过同乡关系，找到一个土医生给治了一治，用竹片夹住指头，骨头才给接住，没成残疾。压伤了，不给休息，还逼着我干活。右手痛得动不了，就用左手应付；可是才过一个来月，左手两个手指又给机器压坏了，再求土医生绑上竹片接骨。两手手指都有竹片，连端饭碗也不行了，不得已，只好把半愈的右手手指上的竹片解开，勉强应付着做活。至于生病，那掌柜的更不管了。有一次，我腿上生了一个大疖子，没有钱去治，腿肿化脓了，师兄帮我挤脓，我咬紧牙关，痛得黄豆大的汗珠直流，脓血挤出一大摊，险些成了残废。生疖子前后三个多月，从来不让休息一下，脚站不稳，只好手撑着身子干活。那时节，工人生病就是这样对付的，没有死是幸运。

干了一年，几个掌柜的要分掉这个厂，我们几个师兄弟一合计，大家说再不替他们卖命了，就各自回了家。我见父亲吃粮都赊着吃，不忍心，又托人进另一家铁工厂。这个厂只有一台手摇的机床，但进厂还要签生死合同。合同规定：学徒三年，帮师一年，没工资，学不满期，保人赔饭钱，死伤无论，病亡不管。我和我父亲签了字，划了押，我忍不住地直流泪，父亲难过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厂的掌柜也是一样心狠，动不动就打。有一次，一个小师弟叫我向掌柜说给他学车工活，

给掌柜听到了，就给他一顿毒打。我去替小师弟说情，掌柜的撇开小师弟，用粗绳使劲地在我身上抽了几十下，又用军用铁锹把打了几十下，打得我浑身发肿，几天不能动弹，现在身上还留着不少绳子痕。那时我才十六岁，不但要干粗活，还要替掌柜的倒尿壶、端洗脸水，沏茶、烧饭、端饭，盛饭、铺被、暖被……，从鸡叫一直干到夜晚二、三点，就是学不到手艺，那时学到点手艺，是偷看一点学一点，再自己琢磨着学到的。

我父亲在西安兵工厂，人家不要了，只好自己做木匠活。那时兵荒马乱，借点木材做点木器没人要，保甲长又成天要我父亲无偿干活，修路，维持他自身生活都不够；我在铁工厂也实在受不了了。我们爷儿俩一商量，乘一天大雪天，瞒住我那掌柜的，偷偷地溜出西安，到宝鸡那边的一家大纱厂干修理活了。两人都是临时工，我这时已经能干车工活了，但还拿的学徒工资，每天上下班也是“两头黑”（天黑），吃的比以前好一些，但也是八个人一盆黄豆芽，一盆清水汤。那时工人要拍把头马屁才站得住脚。我父亲没钱送把头，老转不了正式工，还几次要被撵走。我虽然比一般学徒能干车工活，但还老挨把头骂；把头还老让我干最累的活，工资光够穿鞋子，别的还得靠父亲补贴点。那时厂里对工人搜身侮辱、辱骂不算，一有差错，就绑起来，戴纸帽子、纸衣，敲锣游厂，然后开除。我听说宝鸡机车厂招收技术工人，就偷着去报考，考试合格，经录取为正式技工，我满以为拿到技工工资就好过了。哪知道，那

时先干活，后发工资，等工资拿到手，物价大涨，反而连一个人的生活都维持不住。后来听说附近蔡家坡一个官行资本的工厂招人，又去投考。这时，我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徐州靠我哥哥维持不了生活，揭不开锅，到处求人要饭，她们穿得象花子一样，到宝鸡找我父亲来了。那时我父亲在宝鸡机车厂又混不下去了，后来也到蔡家坡，在我在的工厂一起干活。因物价上涨，两个人的收入不够全家吃，官方还要在工资中扣所得税。我全家又活不下去了。为了找出路，给来蔡家坡买机器招人的宁夏兰鑫机器厂经理骗了。当时招工时说得挺好，我一家都跟着来了，可是一到宁夏，原来是官行资本企业，我和父亲两人领的头等工资，家里仍是有上顿没下顿的。明知上了当，可是资本家仗着马匪的势力，逼工人不干也得干，否则“带钉揭背花，军法从事”。那时我气病了，躺了三个月，以为宁夏是我全家归宿之死地了，要逃也逃不出去。那时工厂上下之间规矩特别重，稍说几句闲话，就玩了命。象技工闫子久讲了几句埋怨话，给领工的找上岔子，当大家的面绑起来用弹棉花的粗牛筋绳索抽背，肉被抽得象棉花那样松出来，血肉模糊，工人们看不下去都低下头来。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官行资本家突然说不开厂了，一个人给一块钱解散费让走，那时候我家已经穷得想走也走不了，我父亲只好做点木匠活，每天的收入也填不饱全家人的肚子。我的头和臂生疮，用布缠起来，也到南关电厂做临时工，后来一

个人干两个厂的活，才勉强维持住全家生活。可怜我母亲流落到宁夏后，一九四六年因为肚子痛，没钱医治，活活地死了。

一九四九年解放，我们工人才算逃出苦海，见了青天。接收电厂的军事代表紧握我的手，把我们鼓励了一番，要我们共同保护好企业，继续发电。我见解放军的代表这样看得起我们工人，心里说不出的暖和劲。马匪的电厂烂摊子，机器常坏，我们尽量抢修，保证不停电。军事代表还经常来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要我们注意休息。我想，资本家巴不得要我们把命送给他们，把我们骨头啃吃了；共产党却这样爱护我们工人。从此我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一九五〇年在面粉厂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现在我在银川机械修配厂工作，已经有五个孩子的父亲了。但是往事老不能忘记。当我看到孩子吃饱穿暖去上学时，就想到过去我们兄妹四个吃豆饼、学艺、流浪的苦日子。看到家里的收音机、手表、脚踏车、缝纫机等，就会想起我和父亲两人在西安连锅子都没有一只的狼狈相。要不是共产党来，我和孩子们还不知在哪里流浪求乞呢？过去我流到哪里，象是不需要的多余人一样。解放后党几次派我跟别人去全国各地参观，到处受到亲切的接待。象我这个穷孩子，要不是共产党来，哪有这样的福份。我看到我父亲年老退休后拿着相当于原工资百分之六十的退休费，过着舒服的晚年生活，就想起母亲贫病死去时的凄惨情景，要是她能活到解放，该多好。看到厂

里大大小小的新式电动机床、大龙门刨、油压机等等，就想起在资本家厂里的手摇车床、皮带车床等破旧家伙，现在这些企业归了人民，发展是多么快啊！有这样好的机器，能不好好爱护吗！我看到厂里的青年工人就想到过去我偷着学艺、忍痛挨打的日子，现在的年轻人是多么幸福啊！

本文作者是銀川机械修配厂老工人

一个老矿工的血泪史

关长秋

每天早晨，吃完早饭，我换上工作服，准备去上班，孩子们也提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这时，我心头充满了幸福。我深深感到，这都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矿工才有了今天这样好的日子。但是，当我庆幸今天的幸福生活时，也常常想起自己在旧社会过的苦日子。

我的家在山东省阳信县。家里有四、五亩地。父亲白天给地主干活，夜里才种自己的地。秋后，打下的粮食，除了交官粮，剩下的还吃不到冬天。寒冬腊月，妈妈领着我去要饭。

在我十六岁那年，父亲听人说，离我们家二百多里远，有个叫里井洼的地方，那里地多人少，能混饱肚子。但是，到那里种地，种一亩得先给地主三块白洋。家里没钱，父亲咬咬牙，借来六十块白洋。到了里井洼，租了二十亩地。那年春旱，庄稼种下后，滴雨没下。好不容易盼到六月份下雨，可是一下就是二十多天，大水淹了地，泡塌了房子。秋后，地没收成，不仅没吃的，连债都还不起。

一九三七年秋天，日本鬼子侵占了山东，穷人的生活更苦了。一天，父亲回来说，东北来个招工的，说东北煤矿要工人，到了那边，高粱、大米有的是，日子好过。晚上，父亲与妈妈商量，要一个人去东北当矿工。妈妈想父亲一个人去关外，要有个好歹的可咋办？“要走，咱们一起走！”。商量结果，全家一起走关东。父亲到招工的那里，说了许多好话。招工的见父亲骨架子大，体格粗壮，就收下了。

第二天，刚蒙蒙亮，拿起全家仅有的一条破棉被，我们来到招工的住处，招工的发给每人两个窝窝头，吃完就上了汽车。一百多人挤在两辆汽车里，每辆车上都有两名荷枪实弹的鬼子守着。汽车走了两天两夜，我们又改乘火车。这种车叫“闷罐”车，四面全是铁皮的，没有凳子，几扇离地板很高的小窗户，也关得死死的。车门口站着两个拿枪的鬼子，等我们走上火车，鬼子就下车，将车门“咔嚓”一声上了锁。坐了两天“闷罐”，才到了北票煤矿。

当天，查头把我们领到工人宿舍。这是个低矮潮湿的草棚子，四面通风，冻得我们浑身直打哆嗦。第二天早晨，查头提着棍子把我和父亲叫醒，领我们到矿灯房，每三个人发给一盏马灯，然后，领着我们向一个倾斜的黑洞走去。下到洞底，查头命令我们：“你们刚来，今天就在大巷里干活，两个人推一辆车，好好干，不许偷懒！”大巷里满地是水，推车工人只能在小铁道上走。我稍一不注意，一脚踏空，掉到水里，溅了别

人一身。下班时，两脚冻得不能动弹了。我咬着牙，爬了上来。回到家里，鞋都脱不下来了，妈妈心疼得直哭。第二天，还得下井去。后来，父亲拿钱向查头说情，要求干轻一些的活。查头见钱眼开，把父亲调去看风门，我去挂链子。一天，我正在干活，忽听别人说，父亲被风门撞坏了腿。我连忙跑去，看见父亲躺在地上，两手捂住血肉模糊的腿，豆粒大的汗珠从脸上淌下来。工人们帮我把父亲抬回了家，妈妈扑到父亲身上哭个不停。第二天，父亲全身发烧，昏迷不醒。父亲是工伤，但是矿主不给治。他们只想怎样剥削工人，怎样多赚钱，不管工人死活，要是工人不能给他干活了，就一脚踢出去。家里没钱医治，父亲病了一个多月就死了。妈妈抱着父亲的尸体哭得死去活来。父亲一死，一家人生活的担子就全落在我的身上了。

以后，我又被调去挖煤，挖煤工每天有定额，完不成就甭想上井。有一次，我正在捣煤眼，一捅两捅，“嘩啦”一声冒顶了。大伙多亏听见响声，往里一闪，没有被砸着。洞门堵住了。我们出不去了。外面的人听说冒顶，以为我们都死在里边了。妈妈听到消息后，一直哭到洞门口，妈妈在外边哭，我在里边喊。我们在洞里蹲了两天两夜，才从一个挖穿的洞口里爬出来。我回到家里，扑到妈妈的怀里哭，妈妈不想再叫我下井了。可是不下井咋成呢？查头一定会到家来又骂又打。第二天，只好下井去。矿上又叫我推车。我力气小，一个人推不

动。鬼子、查头硬说我偷懒，叫来几个人把我两手绑起来，推进一个死人坑里，一边用皮鞭子抽我，一边骂。后来，许多



工人来讲情，说我人小，这几天又有病，才把我放出来。妈妈说：“咱们还是回老家吧！”但是，矿区四周，围了几层电网，想跑也跑不出去。一次，妈妈绕电网走了一圈，鬼子说妈妈想逃跑，把妈妈打了一顿。过了些时候，我二弟也跟我下井了。三弟也长大了，能帮助妈妈拣树皮和干柴了。有一次，三弟到木材厂刨树皮，被看守看到了，看守报告了查头，查头领

着鬼子、监工来到三弟跟前，把三弟毒打了一顿，三弟被打得满身是血痕，再加上吓破了胆，过了三天就死了。

解放前，煤矿是个活地狱，每到夏季，经常闹传染病。这年夏天，又闹了传染病，差不多家家都有病人。矿上虽然有医院，但是不给工人治。一些单身工人病了没人照顾，就只有等死。到了冬天，工人衣衫单薄，冻得实在受不了，有的就围条麻袋，有的披个洋灰袋，还有许多人活活被冻死了。工人死了，就丢在小山上喂日本狼狗，或扔到“万人坑”里。那时候，工人的性命真不如资本家养的狗值钱啊！

解放后，我们矿工才从地狱里解放出来了，真正见了阳光，感到了温暖。党和国家非常关心矿工。矿上认真贯彻安全操作规程，加强了井下通风、防灭火、排水等安全设施，发现隐患就及时处理。工人有病，可以享受公费医疗。年纪大的工人矿上不让干重活。矿上还办了职工子弟学校、托儿所、图书馆、俱乐部等福利设施。解放后，我与二弟都结了婚。我现在是七级工，一家七口人有吃有穿。我二弟在秦皇岛学习了七年，现在是湖北省一个煤矿的区长。我今年才四十三岁，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叫我搞安全检查工作，我从心眼里感谢党和毛主席，我一定要好好工作，为建设我们的国家，使出所有的劲儿。

（曙晟、郝志坚整理 一波插图）

本文作者是石嘴山四矿安全检查员

老三村的血泪仇

夏历闰四月，芒种后十多天，是宁夏川里头茬庄稼临近收获的季节。中宁县恩和公社沙滩大队的大面积麦田，麦穗稍稍齐到人的腰杆子，一抹绿橙橙的望不到边。枸杞子的花卉早已落地，累累的果实压弯了莢条，“老芽”上有的已经泛起了红色，再过几天就是满树的“珍珠玛瑙”，亮晶晶的红成一大片。这当间，稻谷田里也先后撒下了种，今年春雨多，墒气好，加上社员们的精耕细作，庄稼就有了这样的成色！

好庄稼谁见了谁爱，而更懂得爱庄稼的莫过于那些老农们。你看歇晌时，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蹲在树阴下、庄台上喜笑颜开地品评着，不时地连声赞叹：“好庄稼！一定会有好收成！”安庄生产队的老社员安思村就激动地这样说：“好庄稼长的好年景，好收成离不了好社会呀！”这些话，充分道出了沙滩大队老一辈人们热爱人民公社、热爱社会主义的心情！

然而，他们的爱不是凭空而来。下面还是用沙滩老三村农民们自己的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米粮川里老三村

受苦穷人饿断肠

沙滩大队的青年和老三村的贫农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上，老人们倾诉了辛酸的过去。老三村本来是个富足的地方，可是在解放前夕，这个方圆不到十里、一百七十一户人家的地方，有地主、富农十二家，有一百一十九户人家是长工，其中有七十二户还被国民党“讹兵团”抓了壮丁，其余四十多户有的家破人亡，断门灭户，有的则妻离子散抛家外逃了！

为什么同是生在米粮川里，有的人富、有的人穷呢？旧社会那吃人的剥削制度，就是这种不公平的根子。你看！这里有几个令人寒心的事例：

一个叫刘玉福的农民，一家三口耕种着祖传的十六亩田地，按说应该是一份好光阴。可是在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讹兵款”的勒索下，搜干了他的全部血汗，眼看着自己苦下的粮食都流进了“官仓”，这时候他不得不去央求别人。一年，刘玉福的老爹借了地主王成雄一石粮食，第二年地主的“舂斗”利一翻就算成了两石，赶到第二年连官税粮差下来，他家全年收成都折光还短下了好几石。官府差役和地主家狗腿子挥着鞭子和绳索拥到了门上。真是泰山压顶无路可走，刘玉福老爹只得狠着心把自己那十六亩田顶帐还给地主。可怜刘玉福一份家

业就这样被一扫精光，末了还得走进王成雄家的“禾场”去扛长工。

老长工高生发是地主安本初的近邻。他家只有一亩多好田，也被这贪心不足的财迷看上了眼。高生发十四岁那年，老爹死了，安本初假发慈悲地借给他二斗五升粮食和三丈多白土布。赶到第四年头上，不知翻了几个“筋斗”，就变成了四石麦子、二十丈布。高生发不忍心卖祖产，咬着牙到安家去扛长工，整整九年的长工苦，好容易顶清了这笔帐。谁知地主并没有甘心，顶工期满的时候，又朝他张开了血口，一口咬定高生发是“合格的壮丁”，逼的高生发到处请人说情，最后还是以交兵款为名，把房产田地卖给了这个狠心的地主。

老贫农王达顺也是同样的命运。他父亲手里曾经借过地主王佐功家不到十元法币。父亲去世后，王佐功蓄心讹诈，连本带利算了百多元。结果王达顺只得把仅有的五亩祖田折卖给地主家。为了谋求生路，他又被做官的三聋子（地主王成雄三哥）骗到银川去拉洋车，直到挣下了肺病，才拖着残废的身子回来。这时他兄弟也在“讹兵款”的逼压下给地主家顶了兵，七十岁的老妈和年轻的婆姨也成了地主家的上锅人和奶妈子。他自己只得过着挨门讨要的日子，一个好家庭就这样死的死去、抓的抓走，弄得倾家破产、流离四散……。

老贫农孔建善老弟兄四个和王成雄家算是老庄邻了。王成雄“发”家以后，就黑了心，生方设法想霸占孔家这份房产。

那年，王成雄借口“防匪盗”，联络孔家打庄子。一座庄子打成，王孔两家合成了一院，接着打庄费竟给孔家算了一百五十斤枸杞，要孔家立刻交出。孔家拿不出这笔庄费，但又惹不起这个阴险的恶霸，结果本利连翻了几个筋斗，到第三年就变成七百五十斤。从

此，孔家一座四方院共十五间新房，就这样被一张“当约”，连地基都算给了王成雄。

在这种“筋斗帐”、“驴打滚”、

“包庄子”、“讹兵款”等等各式各样的剥削手段下，老三村农民们的血汗便一代接一代地流进了地主和富农的仓房。富汉就是这样越来越富了，穷人也就这样越来越穷了。以安庄生产队为例，过去的



十八户人中就有十四户家庭破产，变成了地主和富农的长工。人们说：“欠帐如同铁锁链，祖祖辈辈挣不断。”这话一点不假，老三村不少农民就是全家老少扛长工，甚至代代家传扛长工。黄万库、白存福、吴正兴、万安银、李占彪、刘玉福等等，你扳着指头数数吧，这样的人家实在不少哩！直到现今，当提起了老三村的过去，农民们就含着眼泪这样唱：

米粮川里老三村，
受苦穷人饿断肠；
两茬庄稼年年收，
颗颗刮进财主仓！

旧社会里受苦人的眼泪流成了河呀！

恶王楨血手发家

四犂子搜刮民财

“杀不了穷汉当不了富汉！”这是财主们的一部祖传“发家经”。

现在翻开老三村土改时候的一本土地册子，还清楚地记载着这几个数字：“全村土地一千四百八十亩，地主、富农占六百四十六亩。”如果再做一番计算，加上地主、富农村外的土地八千多亩，这样，地主、富农的土地总数还要超过老三村土地面积的五倍多。另外他们还分别在中宁、恩和等地开有商

号、杂货庄以及油坊、粉坊、磨坊、酒坊和高利贷帐房等十好几处，夺利刮财。

老三村里最大的地主要算王成雄、安本初、王佐宽三家。其中光王成雄一家占地就有七千零八十多亩，庄子、祠堂、商号、货庄等房屋二百三十多间，高头骡马数十匹和成群的羊只、满圈的牛驴，除庄围田园而外，村外“禾场”有十多处，每年收粮五千六百多石，还有高利贷的净利剥削，每年少者也有好几千银元的收入。这仅是十二家地主、富农中的一户地主的两笔大宗剥削帐。从以上几个简略的数字中，我们可以想见：老三村里的农民们，在旧社会，他们世世代代怎能逃得出那“铁锁链”的束缚，又怎么能够跳出那“长工的苦海”呢？他们怎么能够不“折断腰骨”，怎么能够不“血泪流成河”呢？

老三村的老贫农们控诉中揭出了财主们那血腥的发家史！

说到地主的狠毒，人们首先记起了王成雄的名字。王成雄这个老三村的头号恶霸，可算是近几十年来的一个“暴发户”。他父亲王楨，年少时还会是一个卖豆腐的小贩子，家里并没有多少田地，但当王楨成年以后，就学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街游子”。他同一股帮会的地痞恶棍之徒混在一起，整天舞拳弄棒，不务正业。在吃喝嫖赌的场子里出入鬼混，学得一身拐骗讹诈的本事。清光绪末年时，正遇开科大选，王楨这条恶棍，从考场出来，摇身一变，竟成了一名“皇榜武秀才”。从此，

他便一跃而上，飞黄腾达起来，由一个渠道“委官”升任了县水利“总领”。他大儿早死，二儿掌家，三儿跨入洋学堂后，就钻进了国民党，很快被大官行政客于右任视为宠儿，选派流洋日本，受了高级特务的训练，回国后就做了国民党中央驻宁夏的特派专员。四儿王成雄，也在跨出蒋介石黄埔军校后不久，当了中宁县的地方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又是蒋介石中央的军统特务。从此王家就成了“势大八方”、“威震全县”的“土皇上”。旧社会里象这样的“高官权势”能不血手发家吗？

正如以前曾给三家地主扛过长工的老雇农龙生发咬牙切齿地诉说的那样：“世上豺狼都吃人，天下财主毒蛇的心！”这话一点不差。老三村里的地主、富农，尽管他们发家兴业的手段各有不同，但哪一个不是怀着“毒蛇的心”、张着血盆口，贪婪地吃人肉、喝人血的豺狼呢！这一事实连财主们也不打自招。

如果你现在走进地主王成雄原来的家门楼时，还仍然可以看到，在那飞簷雕壁花边镶嵌的方砖墙上，相对地排着这样八个大刻字：“熊谟肇业、豹略遗风”。

是啊！旧社会的豪绅官仕们从来就是循着他们那反动统治阶级的豺狼之“谟”和熊豹“遗风”而“肇业”起家的。

不是么？当王成雄的父亲王桢这个恶棍甩掉豆腐担子升任中宁县“水利总领”以后，他便板起一副“地方官”的狰狞面

貌，提着一根粗马棒，大步踏上了七星渠，对着连年修渠（原七星渠只通鸣沙，从清末起始向下延修）、开滩而汗流浹背的农民，把那根水利总领的马棒信手一挥，就算取得了“合法”的“领荒权”。他轻而易举地霸占了曾家闸、樊家湾、王家滩、罗家庄、南河滩、白家干滩、彭恩堡等十余处地方。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沿鸣沙以下七星渠两岸大面积川水地的“主人”。所有来这一带开荒耕种的受苦人，都得给他“三七”出租（一百捆麦子交他三十捆）。头一年光曾家闸一处荒田就收来粮租一百五十石。三年头上，生荒变熟地，撤回“租约”，愿干者为长工，不愿干者“扫地出门”。你看：这种横行霸道的豺狼之“谩”是一种多么狠毒的剥削手段！

不仅如此，这条“地头蛇”一面利用职权霸田占地，一面又勾结伪县府包下一座万斤粮的“官仓”，他以这座“官仓”为资本，利用每年青黄不接时期，放出霉烂陈粮，收成以后，一石增交五斗，一年交不清，两年就翻成二石二斗五升。如果粮价低落，就要按放粮时的高价折合枸杞；如此粮价折枸杞、枸杞折粮价，本利打滚，反复推算，就在那血手握着的算盘珠上拨上几个来回，便使多少穷苦农民落得倾家荡产，多少长工遭到了家破人亡！

一个叫钟兆贵的农民曾借过地主一斗粮、五元钱，三年后本利翻滚，连折“三个筋斗”竟算了八十元钱，折合粮食七、八石，结果逼得他卖光了祖传的五亩田地和一份家业。钟兆贵

在那张典田卖产的“草契”上按了手印的血红还未干，便一头栽倒含恨咽了长气！要说王家手里这座万斤粮的“官仓”，究竟坑害了多少穷苦的农民，人们数也数不清！

而地主王成雄家却在这一本万利的“铁算盘”下，大兴了“肇业”的宏图！据当年他的“老管家”曹宗成计算，一年时间连他的“家仓”在内，两宗放粮就收回一百二十多石枸杞（折合粮食竟达万石之巨），这批枸杞满载两木船，运往了天津，一翻手又赚现洋十万元。返回后，就以数万银元资本开设了枸杞庄、甘草店，以及其他四处大商号，进行暴利投机的勾当。从此，王成雄家就成了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人们提起王家四聋子（因老大是聋子，群众把他弟兄四人按排行叫做聋子），无不深恶痛绝。其他几户地主虽然比不上王家官高势大，然而剥削受苦人的手段之凶狠，也不次于王家。就拿地主安大肚子安本初来说，在他爷爷手里仅有三十亩田地的家业，然而到他父子们手里，就学会了一套专营“一本万利”生意的手段。从此便在高利贷和倒贩枸杞的行道上，成了拥有四百多亩土地和几处商号的暴发户。春荒时候他带着笑脸放出帐去，“果月”（枸杞收获）季节，他就圆瞪起血红的眼珠拨弄起“铁算盘”，只要你上了圈套，到时候那杀人不见血的恶手，就会掐住你的脖子。钱利、果价由他信口涨落，哪怕你借他几斤粮、几尺布、几元钱，只要“铁算盘”一拨，你的田产、家业就得姓了“安”！上面说的高生发一家就遭到了这样的下

場，老貧農孫秀英一家的遭遇同樣如此。孫家二十多亩田地、二亩菜園、四間房子、十棵樹——這一份產業，就因老子手里欠下安家几筆零帳，結果被一掃精光，連兩個哥哥也被頂兵抓走，孫秀英自己也被折了一份身價，拉進安家大庄當了安大肚子的使喚丫頭。人們有句話說：“安家的坑人帳是白面一斤、面一斤；枸杞一斤、果一斤；銀元一元、錢一元。”（即借一還二的意思）……

這樣狠毒的剝削手段啊！難怪農民們要控訴：

“刮干骨頭筋，淹不了財主心！
窮人苦斷腸，喂肥了黑心狼！”

窮哥們含冤忍恨

老財們作威作福

老三村的地主們都有幾個頭面，拿王成雄來說吧，他在幫會里是個“惡棍地頭蛇”；在官府里是“總領”、“專員”；在國民黨里是蔣介石的“書記長”和特務；在買賣行里是“投機商”。三犛子的小老婆還和馬鴻逵的四老婆拜了“干姊妹”，歷任縣官也都得登門拜訪，唯命是從。他們就仗着這樣龐大的惡勢力，象一座大山一樣沉重地壓在老三村農民的頭上，使他們祖祖輩輩喘不過氣來。任憑你有多大冤仇，又向哪里去申訴呢？王成雄家一只羊跑到了——一個叫馬雷的農民家里，王成雄知

道以后，竟一口咬住：说马雷偷羊，不容分辩，就指使狗腿子把马家的四十多只羊成群赶进了王家，反倒诬告马雷是“贼盗”。马雷明知王家和官府是“一条毒蛇两个头”，串通一气的豺狼，只好含冤忍恨反向恶霸去磕头求情。这是多么残酷的阶级压迫啊！

老三村的财主们就是这样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剥削农民而过起荒淫无耻的生活。

只说王成雄家这座庄堡，方圆占八亩多地，庄墙高近三丈、壁厚丈五有余、平排两卦铁车可以畅行无阻。再看庄内的建筑，真是高房瓦舍，青砖铺砌，飞檐雕壁，屏风花廊，卧室客堂，书房清台，粮仓灵堂，应有尽有。大庄子内还有“老爷”、“太太”们避暑乘凉的一座三层高楼。庄头上有森严的围房哨所，远禁这座严禁厚实的庄堡，活象一座阴森森的閻王殿。据老辈人回忆，修造这座庄院，除土、木、石、刻等匠四十多名外，还强拉民伕四百多人，里里外外的建筑，从动工到落成，前后历时十年有余呀！

可以想见，就在这座财主的宫院里，该浸透了劳动人民的多少血泪？正如农民们所说：“这都是受苦人们的筋骨和血肉砌成的！”

就连王成雄家祭典鬼神的“王公祠”和家庙，也都是满镶着精雕细刻、五颜六色的砖瓦厅堂。祠郊石碑林立，方围碧绿荫浓。你看：劳动人民的血汗膏脂，不仅滋哺着这些财主“活

閻王”，而且还要浇灌着他们那地下的罪恶死尸！

自从农民田地被霸，修成这座“尸窖”之后，老三村农民的头上便又多了一重灾害。无论人畜往返，都要绕道而行。如果谁家牲畜踏进这个地界，轻则强收霸占，重则鞭打棒拷。哪怕有人在他坟地上踏下一个脚印，都要追踪验查，只要鞋印相仿，就少不了一顿“背花”的刑罚。一次王家狗腿子发现坟地上有个脚印，硬说是老长工黄万库踏了“祖坟”，不容分说揪住黄万库的耳朵要去验脚印，幸好没有验上，然而他的耳朵却已被揪得血流红肿。长工贾德元淌田时，不小心浸湿了一块坟地角，竟被王四祥子一顿马棒打得数月不能起身。

据说，王成雄家过一次婚丧大事，仅那鸾驾仪仗声乐殡礼就要接连十五、六里之长。还有数百名全副武装的伪兵往返护送，仪容威严的列队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排满了庄后一条宽阔的公路。庄院内则高搭彩棚、摆列着“三生”（猪、羊、鸡）、“三贡”（烙、炸、蒸熟的食品）和礼台，数日之内都是鼓乐高奏、灯火辉煌，高餐宾筵、喧闹不止。他家在日常生活中，酒肉奶蛋更是不足为奇。海参鱿鱼、煎、炸、流、烤都是特请的高技厨师。好吃好喝还不算，“少爷”、“太太”们还成天断不了吃各种滋补的药剂，补他们那被荒淫糜烂生活弄垮了的身子。

尖妻同时给王成雄当了十年长工的白存福两口这样说：“财主家要尽了世上的排场，穷人家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过去曾经被顶帐卖身给王家当了十多年使唤丫头的吴秀英、安金梅等妇女们都这样说：“使唤丫头在地主家不如一条狗，入了王家院就如同进了閻罗殿！”王成雄弟兄和他们的老婆都是一双双大烟鬼，早晚在烟灯下盘起二郎腿过瘾的时候，还离不了丫头们的侍候、提茶、端汤、送补药，稍有点怠慢就是一顿毒打。一天小丫头胖菊菊，因为连天连夜的劳累，眼睛熬的红血胖胖，一次给二聋子小老婆“蝎子精”熬补药打了个盹，药沸出来了，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蝎子精”嘴里骂着，顺手从火炉子里抽出一根烧红的火钎，朝着胖菊菊的身上就是一顿没头没脑地乱捅，胖菊菊的头发烫焦了，满身满脸血水横流。睡在炕上的二聋子，却还在哼哼着冷笑。胖菊菊痛断了气，二聋子喊来狗腿子只说了声：“给我拉出去！”见到这副惨景，王家的“使唤人们”都暗暗地落下了泪！

一个叫玉兰的丫头，只因为给正在摆筵迎宾的四聋子王成雄把茶水出慢了一步，四聋子向他小老婆“母老虎”呸了一嘴。玉兰就被拉出客堂，剥光了衣服，一绳反绑吊上了屋梁，四股子皮鞭沾凉水，打的皮开肉绽。“母老虎”边打边骂：“卖给我的人，命在我的手，宰了你不如一条狗！”玉兰在雨点一般的皮鞭下渐渐停止了哀告的呼唤，客堂里却传来了一片敬酒猜拳的狂笑声！

王家院里的主人吃喝嫖赌是“家风”，而最荒淫败劣的莫过于二聋子。这个淫棍家里两个老婆，外面还包着姘头，仍满

足不了他的兽慾，只要他看中哪个女仆，无拘老小都逃不脱他的魔手。姓夏的老长工有个十七岁的女儿，名叫桂子，被他看中了。于是他便以答应把夏老汉养老为名，将桂子哄来当了丫头。桂子进王家不久，二聋子就下了毒手，这纯真的姑娘受辱后，便在一个夜晚含恨服毒了。

請看！有多少无辜的受苦人，在財主家內变成屈死的冤魂而含恨九泉！

砸开項上“鉄鎖鏈”

建設幸福新生活

老三村里的农民们，生活在旧社会的黑暗深渊里，多少世代过去了，尽管改朝换代也推不倒地主恶霸的权势。正如老一辈人们说的那样：“人生一世路子长，谁见这里有太阳！”是的，反动阶级统治下的时代，穷人的头顶上、脚跟下都是官绅豪霸的天地。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哪有穷人的生路？受苦人多么盼望着过上一天自由幸福的日子。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一九四九年，解放的红旗插到了中宁县。老三村里来了共产党，摧残农民的“活地獄”被揭开了，套在受苦人头上的“鉄鎖鏈”被砸断了，地主恶霸的封建堡垒被打碎了。从此，老三村的人民昂起了头。一九五二年大闹土改，斗倒了王家四聋子、安大肚子等这些地主豪绅，土地回到

了农民的手中。阔气的财主庄院住上了当年的老长工。连那座穷人脚跟不能进的“王公祠”也成了农民子女们念书识字的学堂；三聋子王成章、四聋子王成雄已被人民镇压。翻了身的农民永远摘掉了旧社会压在头上的“长工”、“佃户”、“受苦人”的帽子，当了老三村的主人；当了新中国的主人！

下面请你听听，这里的几位老农民在招待前来参观访问的客人时谈出的一番话：

龙生发(老长工，五十七岁)：“我活了大半辈子，当初做梦也没想到，咱这三辈子老长工，能住上这老财主的阔庄院。远的先不提，去年我和老伴挣了三千八百多分，光粮食就分了一千多斤，加上自留地的收入，一家老小五口吃不完！还有一口大肥猪哩！铺盖穿戴都不算数，过去我拉长工十年也挣不下这些东西呀！”龙老汉正说着，一个戴红领巾的孩子欢跳着跑进屋来，老汉起身拉住这个活泼的孩子，他接着又说：“你看，这是我的大娃子，今年就初小二年级了，老长工的门户里也出了社会主义的‘小秀才’”！说这话时，老人家欢笑的脸上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安思村(老贫农，六十四岁)：“如今我们是新社会的当家人啦！这当家人的权把子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我们的靠山就是共产党！在党的指引下，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美，气死那些反对我们的敌人！”

孔建善(老贫农，五十三岁)：“我们靠着共产党砸碎了

祖祖辈辈套在脖子上的铁锁链子。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走集体化道路的号召，又把我们引到了一条光明的大道上来，如今咱劳动人民的劲头算是真正使到了社会主义的正道上。毛主席说的对，做好庄稼是根本，农业生产越高，咱人民公社就越发兴旺了！”

黄万库（共产党员、生产队长、老长工）：“翻身莫忘根本哪！越想起过去，我们的劲头就越大了。老三村的人把那些投机倒把和不走正道的人叫‘败家子’。几年来这号人在我们老三村里是没有过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忘记过去，我们听了党和毛主席的话。你看：我们的庄稼不是越务越强么？我们老三村的面貌在一天天地改变着，社员的光阴一年比一年更好啦！”

是呀！想想老三村的过去，看看老三村的现在，你就会觉得在这些老农民们朴实的语言里，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阶级感情。

住在原来大地主王成雄庄院里的十五户社员中，有一个叫李生金的小伙子。这小伙子刚劳动回来，天又热，他脱掉上衣，光膀子坐在门槛上吃午饭，白面条子接连吃下了好几碗。生产队长黄万库对客人说：“我们现在能把白面当饭吃了，过去能尝一嘴就是好事！”从李生金那光身上，一眼看见一块块横七斜八的伤疤，人们问起他这伤疤时，李生金的母亲叶美如激动地诉说了这样一段往事：

李生金的父亲李四海给地主家受苦一辈子。到解放时，全家只有一个砂锅和两个破碗，这算是他们的全部家产了！一家七口人借住着人家一座六块炕面大的小窝棚，弯腰进门就是炕。窝棚里人挤人只能睡下四口子，剩下李四海老汉带着大儿子和一个女儿，冬天黑夜就钻进乱草堆。夏天卧在露天地。有谁知就连这茅窝棚和露天地上也睡不安然呀！那年老三村里驻扎了一帮国民党匪兵，他们要在这里挖坑道、修炮楼，要李四海一家立刻“滚蛋”。李四海年老耳朵背，连匪兵们的话都还没听清楚，便被枪托刀背打倒在地！一九四九年八月，国民党匪兵被解放的炮声赶跑了，村里驻上了解放军！一天黑夜，劳动了一天的李四海老汉卧在露天地上睡熟了，身旁五岁的男孩子竟被一条下山的饿狼叼去。解放前李四海老夫妇曾生养过七个男孩子，都因为家穷而被灾难和疾病先后夺去了幼小的生命。到解放这年只剩下这一个独子！李四海老汉惊醒后不见了儿子，只摸到一滩粘糊糊的血迹。老夫妇俩哭喊着追寻儿子的下落。惨叫声惊醒了村里的解放军，一位指导员立刻带着全连战士出动了，战士们寻着血迹搜寻着、追赶着！终于从饿狼嘴里抢下了这个遇难的孩子。当那位指导员双手抱起这个血洞满身的孩子时，发现他的肠子已经露在外面，人是奄奄一息了。指导员二话没说，抱回驻地，撕下自己的新被面，小心地紧紧裹住了这个血淋淋的幼儿，连夜乘马送到了团部医院。李四海老夫妇只是淌着失望的眼泪，然而不久，那位指导员竟抱着一个新穿新

戴欢笑活泼的孩子送到了李四海老夫妇的怀中！……

这个狼口得救、死里逃生的孩子就是李生金！如今，他已是个十九岁的大小伙子了！为什么叫“生金”呢？李四海老汉在世时，曾流着泪对那位解放军的指导员说过：“金子是世上的宝物，他儿子生长在黄金的时代里了！”

（中共中宁县委材料室调查组整理 步升插图）

汉延渠畔的悲号

慕 莲 千 里

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张耀坤，是旧宁朔县叶盛堡的“八大乡绅”之一，早年当过地方保卫团团总，大军阀孙殿英的咨议，后来连任汉延渠水利委员、水利局长等伪职。

张耀坤凭借反动势力，残酷剥削汉延渠两岸的人民，强行霸占邻近农民耕地四百多亩，每年放粮榨取高利二百石左右。他在家中私立公堂，自备武装，任意拘捕拷打甚至枪杀无辜人民。附近的许多农民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解放初期，张耀坤又抗缴爱国公粮，破坏土地改革，在土改高潮中伺机潜逃，隐蔽在黄河沿岸，勾结各种反动势力残余，妄图进行垂死挣扎。一九五一年三月，张耀坤被当地农民协会缉捕归案，“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宁朔县人民法院在叶盛堡组织了四千多人的公审大会，依法判处张耀坤死刑，立即执行枪决。

张耀坤被人民处死已经十二年多了，可是现在提起他的种种罪恶来，叶盛人民公社的社员还是恨得牙根咬断。在社会主义阶级教育中，我们记录了二十一位社员的诉苦材料，又查阅

了有关的档案、表册、工作日记，编写出一篇史料《恶霸地主张耀坤罪行种种》。这里发表的，是其中的三章。

汉延渠畔的悲号

张小仓的祖、父两代在张耀坤家中受折磨致死，哪知他奶奶苦心抚育的这棵独苗，又被张耀坤打折腰骨，瘫死炕上，丢进汉延渠！说起来不胜悲愤凄怆。

张小仓的祖父一辈子在张耀坤家中受苦，成年累月的埋头干活，挨打受骂也不吭声，四十三岁上活活地累死了。

小仓的父亲张殿申，十三、四岁上又在张耀坤手下当伙计，放了十年牲口。一九三五年马匪征兵，张耀坤兄弟多人不应兵役，指名叫保长把孤丁张殿申从伙计房里绑去顶名。张殿申被押在堡里，联络几个难友协力撬开门板，舍命逃出班房。当夜跑回本村，跳进自家院子，隔着窗户安抚母亲说：“我要进山去避难，娘要多吃苦了。”张殿申逃到炭山上，背煤熬了一个冬天，连累带冻得了重病。转年四月，趴在毛驴背上，请脚户驮回家中，十五天以后便死去了，年仅二十六岁，抛下老母弱妻，和一对孤儿。

张殿申家一贫如洗，又丧失了主要劳动力，他女人只好改嫁了。临走时她舍不得一双儿女。守寡多年的婆婆却坚持要留下个后代根苗。既然是不愿叫男孩随母改姓，女孩子也就不便带出去增添别人的家累。于是，老奶奶挑起了抚育一对孤儿的

重担。

那时小仓七岁，妹妹只有两岁。

一个孤老婆子抚育着两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是多么艰难呵！可是灭绝人性的张耀坤，却对老奶奶说：“你家没有人了，地给我种吧！”当下把他家的六亩养命田全给夺了。夺田不算，还要逼着孤儿寡妇如数完粮。老奶奶抱着小的，撂下大的，今天躲沟渠，明日跑河滩，从秋到冬不敢着家。一天深夜她回家来看顾孙儿，被征粮的堵住了，押进班房里打手板逼索钱粮。老奶奶只得忍痛拆了碾磨变卖缴差。缴不够数，张耀坤又叫保长传过话来：“挖了房子卖木料，也得缴清钱粮！”

好歹总得有个住处呀，小仓奶奶空口向张耀坤求情，嘴唇磨破也是没有效验，只得狠狠心叫十二岁的小仓到张耀坤家去白给人家放牲口。

张耀坤叫小仓赶上两匹马、两匹骡子，四头牛，外加二十多只羊一齐放牧。顾着赶骡马，牛羊撂在后头了；回头轰牛羊，骡马又跑得没影了。小仓回家对奶奶哭着说：“我干不了这个营生，两条腿都跑肿了，也挡不住那么多牲口。”奶奶说：“傻孩子，你不给他放牲口，叫奶奶拿啥给人家完粮呢。”说着流下两行老泪。祖孙俩个哭了半天，才想了个主意：叫六岁的毛毛帮助哥哥去放牲口，大的吆骡马，小的看牛羊。

张耀坤白使着这一对小兄妹不给工钱不说，饭也不让吃饱。有一天吃罢晚饭以后，兄妹俩才把牲口赶回来。张耀坤站

在二门道里，看了一眼却说：“牲口还没有吃饱，你们倒急着吃饭来啦！”立刻命令小仓连夜放牧，罚毛毛去刷锅。他家大灶的锅，可以煮二、三十人吃的饭，锅台比毛毛还高。毛毛只得爬上锅台，探身到锅里去刷。刷着刷着，饿得眼睛发黑，差点栽到锅里去。

小仓刚刚长到十六岁，就被逼着跟长工一样担负繁重的劳役了。这年冬十月，张耀坤叫小仓到李俊堡戴家庄他姐夫家里去帮工。临走时不让带口粮，到了那家又光叫干活不给饭吃，也不让进屋睡觉。张小仓白天下湖干活，夜晚睡在柴草堆里，一日三餐挖萝卜吃。把一方田的萝卜挖吃完了，只得连夜跑回来向奶奶要吃的。

小仓奶奶一见孩子饿成这个样子，连忙从邻家借来一碗面，擀了两碗汤面给他吃。小仓边吃边哭边向窗外张望，奶奶看着可邻得叫心呢，便安慰他说：“放心吃吧。天黑断了，张耀坤看不见了。”第二天天不明，老奶奶就起身用烂布缝个小口袋，把家里仅有的半升黄米装了，叫小仓带上；又扫出点碎米，熬了稀粥，叫小仓趁热喝了，赶快上路回李俊。这时天色渐明了。

张小仓刚刚走到村北的小渠旁边，张耀坤就发现了，掂着手杖追赶过去。小仓奶奶吓得浑身打颤，扶着墙头死盯着小仓逃跑的脚步，心格登格登地跳着。后来看见小仓跑远了，身影儿消失在一片浓雾里，这才长出一口气，回到屋来刷锅洗碗。

忽然，毛毛跑进来惊呼：“奶奶，张耀坤掂着棒打你来了。”奶奶抱着毛毛说：“让他来吧，反正你哥哥逃脱啦！”

张耀坤冲进门来，一把抓住老奶奶的头发，按在炕沿上，抄起一个大冰盘朝头便打。三道鲜血渗过苍白的头发，流到嘴角来。张耀坤丢下半死的老人，拔下小锅，把剩在锅底的米汤倒进灶膛里，又用大棒把铁锅砸了个粉碎，狠狠地说：“吃我稀的，拿我干的，全家做贼！”

小仓奶奶的外伤逐渐养好了，可是脑袋还疼的厉害，三个月不敢挨枕头。困极了，趴在窗台上迷胡一阵，直折磨得全身蜕了一层老皮，才算能够行动了。在老奶奶养伤期间，小仓领着妹妹，白天给张耀坤干活，夜里悄悄地回来照顾老人。若是没有这个被苦难磨炼得懂事过早的乖孩子，老奶奶也就熬不过这场大难。小仓奶奶虽然身受重伤，日月艰难，可是到底看到了生活的指望——他家的独苗长大了。

谁知道连这一点点指望很快地又破灭了。第二年张小仓给张耀坤的弟弟张耀松放牲口。张耀松引水灌田时犯了糶，回家去吸大烟。水大了，漫过田埂流进张耀坤的菜地。张耀松听说了，躺在烟灯旁不愿动弹，打发小仓去拦水。张小仓赶紧提着铁锹去堵水，不想张耀坤从身后赶过来了，硬说小仓成心决口放水，要毁他的庄稼。说着，把小仓按在水里，夺过铁锹连劈带打，当下把小仓的脊椎骨打断，胯骨也打坏了。老奶奶听到凶讯跑去，小仓躺在泥水里人事不知，央人抬回来，养了好久

才会说话，但是腰再也直不起来了，更不能下炕行走了。

小仓这个刚强的孩子在炕上瘫了几年，就硬熬了几年。他时常对妹妹悄悄说：“我不能死呀，我死后你和奶奶都得饿死，咱家就叫人给灭绝了。”可是他终究熬不过伤、病、饥、寒的折磨，手脚逐渐失灵了，全身逐渐瘫痪了，眼皮逐渐合拢了，只是最后的一口气，怎么也嚔不下去！就这样整整熬了十天，他才对奶奶说，“我要撂了你啦，闪了你啦。我活着没让奶奶过一天好日子，死后，又怕你连毛毛……”

小仓死后，老奶奶没力量、也没地方埋葬他，只得卷起炕上的破席，把他的尸首裹了，求人扛到渠坝上，投到汉延渠里了。老奶奶面对着滚滚的渠水放声悲号：“这是挖根断苗呀！”

解放后，毛毛改名张淑珍，招了个孤儿作女婿，现在已有两个女孩，三个男孩，一模一样地生着又黑又短的睫毛，微微发凸的大眼睛。老奶奶对我们讲述旧社会的遭遇时，这些孩子肩靠肩趴在炕边，齐仰着小脸儿，静静地听着。当我们问讯张小仓的相貌特征时，老奶奶向炕边一挥手说：“长的都象他舅舅。想仓仓想得我心乱了，抱起一个亲亲，就觉得心平一些……”

寸寸土地都有农民的眼泪

张耀坤官运亨通的年代，拥有四百多亩田地，东起官道、

西至汉延渠连成一片，占去了张庄、哈村可耕土地的十之八九。这一大片土地原来多半是属于贫苦农民所有的小块稻田，逐块地被张耀坤蚕食霸占去了。说起来寸寸土地都浸透了农民的眼泪。举两个例子。

哈立业老汉的耕地早被张耀坤的父亲霸占了大半，他把两个小儿子卖到河东，带着长子哈明种田兼卖短工，生活还是很困难。到一九三一年上，只好把祖坟周围的八亩荒滩开垦耕种。父子俩正在田间播种呢，张耀坤带着武装乡丁赶上来了，硬说哈家的坟地应该归他所有。哈立业指着祖坟辩理，张耀坤说：“几块臭骨头摆在我家地里，还没找你算租呢！”说着指挥乡丁，把哈立业父子赶走，把农具砸碎了，又传人来当下把哈家的祖坟平毁了，全部抢种上他家的庄稼。

转年开春，哈明和他父亲只得到河东扛长活去了。一九三五年秋天，哈明因为逃避抓兵回乡。刚到家门，保甲长又满村追捕他去当兵。哈明走投无路，逃到张耀坤的柴院里躲避，恰好叫张的婆姨看见了，死拉活扯叫给他家干营生，哈明别无出路，只得在张家苦了一年。张耀坤的伙计难当，是远近闻名的。一九三六年冬哈明就辞工不干了。当时张耀坤表面上好言挽留，暗地里串通保甲长，要把哈明出卖当兵。哈明闻讯，跳到林泉堡，给姓胡的地主种地。

一九三八年哈明女人怀了头胎孩子。房主借口他家死人不过百日，不许孕妇在屋里生产。这时，哈明有家难归，只得一面央

求，一面捱磨着。秋末冬初天气，女人就要生产了，哈明照例清早就下地受苦去了，哪知他女人临产时，竟被赶到猪圈里去！哈明傍晚回家，只见女人跪局在猪草上昏迷不醒，初生的婴儿掩埋在狂风吹起的灰上堆里了，扒出来一看，七窍已经堵死。哈明丢下孩子，赶忙扶起女人，安顿到邻家去避风；转身又提着把铁锨，想去埋葬死婴。多亏一位张奶奶，劝他天明再埋也不迟，又帮助他把孩子抱进屋里，洗净了裹在烂皮袄里焐了一夜。五更时，这孩子忽然哭出声来了……这个孩子乳名“圈圈”，好让他记住落生时的苦情；解放后取名哈治国，现在是光明五队的青年社员。这是后话。

哈明娶妻生子以后，不能长期在外边流浪，1940年带着妻儿回乡务农来了。哪知张耀坤不但霸着他的耕地不许下种，还逼着他完纳被霸去的田地所担负的錢粮。这时，哈明听说陕甘宁边区收容难民，拨给房屋土地，贷给耕牛籽种，并且三年不收公粮，于是下定决心去投奔边区。一九四一年的一个深夜，哈明用堡垃封死屋门，扶着女人，抱起孩子，告别了苦难中的家乡，走向一个新鲜的陌生的自由天地。

张耀坤听说哈明投了解放区，对他恨入骨髓，立即派人把哈明的房子挖了，木料抢去盖猪舍，房土下田当肥料，连祖先牌位也给砸了。

过了几年，哈明挂念父亲，回到河东来看望老人。张耀坤听说，差人把他抓了来，硬说他是“红军探子”，绑起来解送

伪宁朔县治罪。半路上，哈明设法逃脱了，直到解放后才回乡来参加了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如今再说张武成老汉，因为家贫，打发儿子张礼到瞿靖堡纸坊去做工，他留在家里作务庄稼。有一年马匪帮勒令农民种大烟，张武成奉令种了二亩，伪乡长李河（张耀坤的同党，一九五一年同案处死）却要他缴六亩的烟税（每亩烟税约合十亩田赋）。张武成担负不起，只好全家逃亡，到瞿靖一带去另讨生路。

离家的时候，老汉把田地、房屋嘱托给侄女婿照看。张耀坤知情，立即派人把他家的十七亩土地全给霸占去了，门前堆着的六、七十车粪都给拉走了，院里放着的一对大车轮也给推去。随后又拆除了他家的一间里屋，把房土木料抢去自用。剩两间孤零零的房壳，禁不住风吹雨淋也塌毁了。日后张武成回乡没有住处，只得拣起几根烂椽，搭个窝棚暂时安身。可是张耀坤赶尽杀绝，又叫伪保长找来，说是马匪军粮局盖仓房，要征用木料，连那儿根烂椽也给抽去“充公”了，闹得张武成全家连个躲风避雨的地方也没有。

可是，迫害还没有完结。张武成死后，他的儿子张礼在纸坊失业，回家来租种二亩地勉强糊口，张耀坤又叫伪保长逼迫他完纳被霸去的十七亩祖业田的钱粮。张礼对伪保长说：“那地张耀坤强种多少年了，我没收过一颗粮食。”保长说：“我们按册催粮，管不着谁种你家的地。”

一九三二年马匪派个姓姚的征粮专员坐鎮叶盛堡，派出狗腿子四乡抢粮。那年张礼租种地收下了八、九斗糜子，还在場上就叫他们全部装走了，接着又把张礼綁起，押解到堡子去治罪。当夜押在班房里，先打了二百戒尺、六十马棒，转天才去见官。张礼忿忿不平地对姚某说：“你是政府专员，要讲个理呢！自古的王法：粮随田走。我粮不差寸合、草不差寸节，该缴的统缴了。为什么张耀坤霸种我家的田，还要綁我来逼粮？”那专员无话可说，装腔作势地问：“谁叫张耀坤？这么霸道！本专员倒要会会他。情节属实，一定严办！”说着差人去传张耀坤。张耀坤沒有传到，张耀坤的走狗罗大营倒笑吟吟地走来了。他晃着长烟管说：“报告专员，张耀坤病着呢，請您到他的寒舍面叙。”

那天张耀坤正娶小婆儿，家里宾客盈门，大摆酒席，滿座尽是大官仔大绅士。姚专员进门就溜边坐了，又赶着给张耀坤道喜。吃完酒席，张耀坤很随便地对他说：“地我种着呢，人先放了吧，今天我办喜事。”不大功夫，姚专员打发人出来给张礼松了綁，限期完纳十七亩的錢粮，并且向张礼索取办案的“手续费”。气得张礼狠狠地啐了他一口。

这年冬天，张礼忍痛卖了十一岁的女孩去缴錢粮。

三个了环的命运

张耀坤祖父以来，传下一条发家的本领：以收养义子义女

为名，强迫贫苦农民的儿女作他家的奴隶。张耀坤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一年间，有三个“义女”——实际是使唤丫头。

一个丫头叫凤凤，瞿靖堡马寨农民赵二的小女儿。赵二家贫，把儿子从小就打发出去给人家放牲口，大女儿也早早地出嫁了，可是光阴还是很艰难，万般无奈从张耀坤手中借去九斗粮食，滚不了几年，竟变成三十元钱的债务。赵二无力偿还，张耀坤就指名强迫凤凤卖身抵债，那是一九三二年秋冬的事，凤凤只有十二岁。

和凤凤同时卖身的，还有一个更小的女孩，名叫带兄。带兄姐弟九个，三男六女。五个女孩先后卖出或嫁出去了，全家还是难以糊口。秋风紧了，一家老小在炕角落里卷缩一团，愁着怎样熬过这个严酷的冬天。这时候，张耀坤新娶小婆儿，想讨个使唤丫头，过不几天，就差人来谈交易了。带兄爹对她娘小声说：只有卖掉这个最心疼的女儿，才能顾全老小的性命；再说张耀坤指名要人，不给也不行哇！

带兄那年只有七岁，听说这话，滚到父亲怀里痛哭求情。父母也只能陪着她放声大哭，还是老奶奶宽慰她说：“张耀坤的小女人，是我堂姐妹的亲生女儿，说起来还是你的姨母呢。虽说是远房亲戚，富不认贫，看在老辈人的面上，她也不会苛待你……”这话与其说是宽慰七岁的孩子，不如说是老人家自寻宽慰呢。

在凤凤和带兄进入张家门以前，先有郭家寨一个叫桂桂的

女孩儿在那里受苦了。这三个女孩，家世相仿，命运相同，年龄又相差无几，自然就结成了同生共死的患难姐妹。

她们所受的苦难折磨，真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先拿日常的家务劳役来说吧——张耀坤家中除了大小婆姨、姑娘小子而外，还喂着十几口猪、四五条看门狗和没有准数的办事走狗。这些人口畜牲的吃喝屙睡，以及一切家务杂差，全靠三个女孩儿来支应；除此而外，她们还要为八九个长工和若干短工起早贪黑地准备饭食，开饭稍迟，张耀坤就要以“误工”问罪。张耀坤舍不得让雇工吃饱，叫他婆姨监视着限量下米；可是饭吃亏了，雇工不能下地干活，张耀坤又要殴打煮饭的丫环来出气，指槐骂柳地吼叫：“你瞎了眼！猪肚子多大，人肚子多大，也看不清楚！”

张耀坤一家男盗女娼，父女乱伦、叔嫂通奸，可是对待“下人”却是家法森严：女工不许轻出二门，男工不得擅进内院；丫环们把长工的饭食做好，摆在二门道里等候取食；长工把粮食扛到二门，得由丫环们搬到仓房里去，带儿刚刚九岁，就被逼着上房晒粮食，背不动从房檐栽下来，张耀坤还打着骂她“不中用”；风风十三四时，就一冬一冬地下碾道，有时一夜功夫要碾出几袋粮食，只换牲口不换人。后半夜风风又冻又困，只得跟着牲口尻子跑个不停。跑暖和了，赶紧扫碾，簸米，添粮食；又冻得站不住了，再跟着牲口跑上几十圈儿……那时她真羡慕眼前的牛马呀，牛马卸了套还可以归圈歇缓一

阵，可是凤凤碾完米，又要去侍奉主人了。

张耀坤比什么牲口都难侍候，给他端饭他嫌饭碗洗得不干净，给他打洗脸水他说井水太浑，给他沏茶非要柴草烧开的水不喝，给他炒菜不能使用他亲见杀生的鲜肉……一旦触犯他这些数不清的禁忌，轻则拳打脚踢，重则皮鞭棒棍一阵猛打。有时候，丫环没犯任何过失，也会无辜遭打。有一回，张耀坤的大小婆姨因为争风吃醋呕了气，各自跑回娘家去了。张耀坤回家来却追问丫环：“看见她们往娘家裹带什么财物没有？”三个丫环据实回答：“没见拿去什么东西。”张耀坤立刻命令她们扒掉棉衣，跪在院心里，轮番拷打着逼问“口供”。凤凤招打不过，只得假说大婆姨揣走一打钞票。张耀坤连夜叫回他的婆姨，逼着凤凤当面对质。结果，张耀坤夫妇一齐动手，又把凤凤狠打了一顿。自从进了张耀坤的门，挨打挨骂成了三个丫环的家常便饭，这个青伤还没有褪尽，那个红疙瘩又起来了。

三个丫环白日里受尽奴役这且不说，黑夜还要倍受煎熬。张耀坤作贼心虚，天一黑就担心有人来放火、行抢。外院里有人保镖，大门上有人站岗不算，还要丫环们通宵守夜。遇到月黑风大的夜晚，偶而听到一声狗咬，他就叫丫环上房去看风声。女孩子体弱衣单胆子小，爬上高房看一会，不见什么动静，赶快下来回话。张耀坤又说偷懒，打着骂着叫再爬上房去仔细察看。丫环二次上了房，不敢再来回话了，就得在房顶上直蹲到天明。就是没有任何动静的夜晚，丫环们也不能安生睡

觉。一会儿大婆要吃夜宵，一会儿小婆叫端洗脚水，一会儿张耀坤又叫烧水沏茶……折腾得三个丫环不得一刻消闲。张耀坤有时从梦中醒来，呼叫丫环的名字，可是并没有什么差遣，只是测验丫环们睡着了没有。如果被叫的不能应声而到，张耀坤爬起来，就是一阵皮鞭乱打。害得三个丫环长年不敢上炕睡觉。困极了，把两条长凳并起来，一头趴着一个打盹，中间端坐着一个，支起耳朵静听着上房的呼叫，叫哪个就赶紧推醒哪个去支应。听见鸡叫了，赶紧把两个一齐推醒，分头去打水，点火，扫地……进入第二个难熬的日子。

苦难的日子何时到头呢？三个丫环时常偷偷地张望着黑色的大门，呆呆地痴想着；有时爬到房顶干活，偶而望见邻家孩子的生活情景，也会自伤自怜起来。别家的孩子不管多么枯瘦褴褛，终究没人打骂，有人疼爱呀。三个丫环私下商量，在腊月二十八那天深夜里集体逃亡了，分头跑回家去。带兄年小，不认得路，在大渠坝上摸到天明，急得大哭起来。多亏遇到一位拉草的老汉，把她捎回本村。带兄在老人的草车上睡着了。多少年来，她第一次这么安稳这么温暖地睡着了。

奶奶和母亲见孩子被折磨得“活鬼”一般，心被剜去似的，抱着孩子痛哭失声。带兄断断续续地对亲人诉说自己的苦楚。还没说出十分之一的功夫，张耀坤的爪牙扮作卖辣面子的小贩，挤进门来了。带兄一见扎在奶奶怀里，死活不肯再去张家。狗腿子说：“太太有话：“叫带兄立时回去。明白人知

道娃娃小，不懂事，上了天堂也避不住想家；糊涂人也许猜疑带兄受了什么委屈呢。”她母亲苦苦哀告说：“求太太宽限两天，好歹叫孩子在家里过今年，……”狗腿子横眉立眼地斥道：“你们穷家寒舍的，有什么年好过！我们太太还给她准备着好吃喝呢。”说着就动手去拉带兄。奶奶死搂住带兄，欠身求情说：“那掌柜的就暂缓一步，叫我给孩子梳洗缝连缝连，也好增添他张家门上的光彩。”那狗腿子一把推倒老奶奶，拽过带兄，恶狠狠地说：“这话你对老委员说去！限定午时向我要人呢！”说着把带兄拦腰抱起，掉头冲出屋门去了。带兄的哭喊声象锥子似地扎着奶奶的心，母亲的心，四邻父老、婶子大娘、姐姐妹妹的心，可是当时谁也无能力改变带兄的命运。

带兄被带进张家二门，就见桂桂、凤凤穿着一身单衣，战兢兢地跪在院心里，张耀坤用填炕的叉棍正在那里猛打，凤凤的脸上肿起拳头大的红疱。带兄吓得扭头就跑，张耀坤婆姨顺手掷来一根火箸，把她的腿腕一下穿透了。带兄腿上别着沾血的火箸跑出二门，伙计们帮她拔下火箸，裹了伤口，藏在草堆里过了一天一天。她只觉得半截大腿钻心的痛，连饥饿都忘记了……半夜以后，她听到鞭炮响，知道是过年了。多么难熬的一年呀。

转年春天，柳条绿了，桃花开了，可是春风吹不到这三个苦命的女孩儿身上。在一个春寒袭人的五更天里，三个人局促在灶坑前挤着取暖，商量着怎样才能结束这个不幸的命运。逃

跑既然沒有生路，那就只好尋死自尽了。刚好灶旁就有一眼井，可是石头凿的井口太小了。三个人同心协力地搬它，撬它，却纹絲动它不得。于是三个人轮番试验着，想从井口挤下去。哪知两腿伸下去了，屁股下不去；脑袋钻进了，肩头钻不进去。这时鸡叫了，三个女孩只得抱头痛哭一阵，各自去干营生。

薅稻的季节，凤凤把到张家卖短工的一位老奶奶拉到墙角，悄悄地问：“街上有井沒有？井口有多大？”老奶奶安慰她说：“好孩子，快別生这个念头，我也不能做出造孽的事。你们年纪小，往后的日子还长呢。现在吃苦越多，将来享福越大。好生熬着吧，总会有个出头的日子。”这话虽然带着一层迷信的色彩，可是它终究透露了劳动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坚强信念。正是这种信念，支持着三个女孩子苦熬了八九年难熬的光阴。

一九四一年张耀坤因为在官場斗争中失败，把三个女孩儿转手出卖了。桂桂被送给宁夏伪军法处处长杨四和作妾；凤凤嫁给叶盛堡小摊贩王福为妻，张耀坤勒索“彩礼”二百元；带兄嫁给本乡农民张殿礼，张耀坤只要了五十块钱，因为张殿礼原聘订的是桂桂，早已纳过彩礼了，带兄只是个替身而已。

三个女孩儿虽然脱出了张家大门，情景还是很凄惨的：桂桂穿着张耀坤小婆的一身旧衣裳被送到城里，当时曾引起地主婆姨的啧啧称羨，其实善良的人心里明白：杨四和不但是个军

阔，又是马匪鸿逵的女婿，桂桂跳出火坑又跌进苦海里去了。凤凤穿着婆家送来的布料、自己缝好的红棉袄出阁，富家女子讥笑她：“上身光堂，下身烂脏。”带兄临嫁的时候，不但没有一件囫圇衣裳，脚下还露着指头。她连天昼夜地纳起一对鞋底，可是没有布做鞋面，只好揣着光鞋底上了喜车。下车时，娃娃们吵着闹着指划她的旋帮鞋，羞得她的脸蛋儿比喜联还红。

现在桂桂下落不明，结局的悲惨，想象可知。凤凤取名赵凤英，带兄取名于秀珍，都是叶盛人民公社的社员，夫妻和美，子女绕膝，生活逐渐好转。解放后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幸福了。

下
心
国

慘絕人寰的活地獄

——記前宁夏皮工厂老工人对馬匪的控訴

宁夏日报记者

敲骨吸髓的“工厂”

解放前，统治宁夏的马鸿逵匪帮，为了供应那支残害人民的反动军队的军事需要，在伪军需处下设立了“宁夏皮工厂”。这个厂，对工人实行了赤裸裸的封建的、法西斯的统治和敲骨吸髓的压榨。在这里，所谓“厂长”、“管理员”等就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匪徒，所谓“工厂”无异于死牢，“工人”无异于囚犯，“做工”无异于服终身苦役。

马匪帮用直接掠夺的手段，开办了这个厂，从厂房设备到原材料等都没有花资本。他们抓捕泥瓦工和木工来起房造屋，建筑材料是从人民摊派得来的，主要原料皮毛也是从牧民那儿强征来的。他们曾规定凡是养两只羊的，不论大小，就得缴毛皮一张。

厂内设皮工場和鞋工場两部分，产量最高的一年——一九

四七年产羊皮四十万张，其中二毛皮供马匪向外省运销，赚取利润；部分供马匪集团当官的穿用；粗毛皮制作军大衣，供应匪军部队。工厂的工人——皮工和鞋工，是利用反动军队和伪乡保甲长在各地连打带绑地抓捕来的，大多数是受雇于人的贫穷匠人和摆摊的手艺人。象解放后银川皮革厂退职老工人高旺，解放前原是银川的熟皮工人，怕受拘捕，曾逃亡到平罗一带做工，最后还是被马匪帮抓住入了前宁夏皮工厂。现在的银川鞋工厂老工人包占林，原是前名胜鞋店的工人，也是被伪保甲长强征入了前宁夏皮工厂。抓进工厂，工人立刻被迫交出身份证，家中户口也随着注销，于是就完全丧失了行动自由。

人間的地獄

在厂内，工人一天得干十六七个小时，从早上八时开始，往往一直做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有时甚至到次日晨一时才能歇息，规定皮工从裁制、缝合到滚边，每人每天做四尺长的老羊皮大衣两件，鞋工一天得做六双牛舔鼻军鞋。手艺强的匠人还能拼死拼活地应付过去，手艺一般的往往因交不了差遭到毒打。现在的银川鞋工厂工人王光明，那时因无力干完派给他的活计而遭到毒打，结果双耳失聪，成了聋子。

在工作场地，随时有工头来回巡视，他们手持皮鞭验收工人的产品，一边还不断地骂：“要是冬天部队穿不上衣，老子就剥你们的皮”等等。他们见到有些班（工人被编成班）快做完

活了，就随口说“你们班再做五件”、“你们班再做七件”。只要工人还剩一口气，他们就要尽力榨取；工人被逼死了，他们就再从外边抓人补充。当时工人做工谈不上劳动保护，数九寒天还逼着工人到城外河里打开冰层下水洗皮。老工人高旺腿部为此得了溃烂病，从那时起曾连续烂了八九年，直到解放后才治好。工人做工没有正式工资，有时一两个月发给极少的钱，有时两三个月一点不发。就是发给那点钱，在伪币剧烈贬值的时候，也往往不够买一把韭菜。工人本人的衣着、零花钱没有着落，新抓来的工人一年半载下来，就衣不蔽体了。大多数工人夏无单衣，冬无棉服，整年被挂着烂羊皮，养活家口的事就更谈不上了。现在在银川皮革厂工作的老工人雷恩智，一九四三年被马匪抓入皮工厂起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为止，前后整整七年没有分文捎回家，家中妻子儿女三人靠做工、借债度日，几次都差一点被饿死。

工厂没有宿舍，在哪儿干活就在哪儿席地而睡，冬天工人都没有棉被，只好蜷卧在皮渣子（皮毛上剪下的边角料）里过夜；春夏虱子满满地往身上爬。工人吃的是熟皮用的霉黄米、黑面馍，还不让吃饱，霉黄米饭每人只给一勺，黑面馍每人只发两个。另有一点下饭用的汤，这点汤，既算是“菜”，又算是“开水”，因为工厂不另供应饮水。工人生病，厂方不管，没有医生，又无药物，也不准到外求医，只要病人稍能支撑得住，还要你抱病干活，实在撑不住倒下了，狗腿子们还要说是

装死，免不了要挨上几脚。现在的银川皮革厂皮毛车间主任郑福林说，当时和他同班的一个黄渠桥的皮匠，一九四五年得了重病，有一天早晨实在支撑不住了，便坐在门槛上休息，遭到厂内爪牙毒打而死去。老工人孙勋德也谈到在一九四七年冬天，早上吃饭点名时，同班竟少了两人，到屋内一找，他们都已死在皮渣子里。在这种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下，工人体质都软弱不堪，伤寒等传染病经常流行，感染上传染病的工人，就被抬往空屋地上一放，死活“听天由命”。现银川皮革厂工人张鸿公说，那时三四百名工人，一年要死几十名，只见源源不断往里抓，却不见活的放走，许多人不是死于疾病，就是活活地累死或被折磨死了。

野蛮的刑罚

厂里对待工人，完全实行军事武装管制。平时厂内驻有一连马匪军队，负责站岗、放哨、看管工人，厂方还能随时调动伪银川公安局警察、陆军、便衣队和军法处的宪兵来对付工人。工人在这样严密看管下，外县外地的工人根本不能回家。银川工人即使在春节要回家与亲人团聚，必须找铺户具保才能请假外出几天。现在是自治区畜产公司的干部韩祥，回忆一九四七年过春节的情况时说：“当时我找了十个人具了‘连环保’，才让我回家过节”。工人稍有不顺从的地方，就会受到各种极为残酷野蛮的刑罚。如郑福林有一次没有驯顺地听从爪

牙们的吩咐，被便衣队抓去搗了“背花”（两人从两旁将工人左右手拉开，第三人用马鞭在光背上狠抽，打得皮开肉烂，血花四溅）。被抓回的逃跑工人，有的受到打脚踝骨的处罚（将工人的脚踝骨平放在砖上，从上面用硬木棍敲打，不到打碎骨头时不停手）；有的被钉上脚钉，有时脚钉不够，就两人合带一副，吃饭做工睡觉都得两人成双行动。老工人高旺逃跑回家被抓回后，就长期被带上脚钉干活。



工人不堪忍受非人的虐待，总是要起来反抗的，但也招来了土匪帮更残酷的镇压。一九三八年，鞋工以朱耀三为首，曾经向厂方抗议工人所受的恶劣待遇，要求增加工资。厂方以谈判为名，将朱耀三等诱至伪军法处，引出宪兵，当场将朱耀三活活打死；工人黄忠仁为朱耀三求情，也被按倒在地一顿痛

打，大腿上的肌肉尽被打烂。有的工人千方百计设法逃跑，但即使能侥幸逃脱，也会因伪军警和乡保甲长到他家中寻事肇祸而连累家人。象现在的银川皮革厂老工人武镇银，逃出了工厂，但马匪立刻将他的老婆抓来当缝制皮衣的工人。其他资本家开设的皮工厂，怕惹怒马匪也不敢收留这个厂逃跑出来的工人。这些工人逃跑出来后找不到工作，又不敢回家，有的逃往定边老解放区，有的抛弃川区的家屋田园，举家逃亡到干旱的陇东一带山区；也有逃到兰州、包头等地做工的，但马匪也不放过他们，时常从兰州、包头把他们抓回。也有的工人实在忍受不住这种残酷的生活而自杀。老工人曹国林说：“当时和我同班的青年鞋工王志强，被抓进宁夏皮工厂后遭到种种残暴迫害，家庭生活又无法维持，他感到走投无路，就用自杀来作为对那个吃人的世道的控诉。当时剖腹的伤口还不小，只有少许肠子外流，如经过及时医治，并不会死。但是马匪厂长贾西廉听工人报告后却冷冷地说：“他自己要死，就让他去死吧！”

(步升插图)